社史研究

通讯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主办

2016-1

SHE SHI YAN JIU TONG XUN



1988年5月，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在贵州毕节地区农村考察，为该地区寻找科技致富之路



担任贵州省副省长时的徐采栋（左二）正在考察蔬菜试验基地情况



1992年4月，徐采栋（中）在第二次振兴大西南经济研讨会上发言

封面题字:韩启德
二〇一六年第一期(总第 12 期)
主　　办: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主　　编:郭　悦
本期编辑:眷建军　於　亮　段正初
出版日期:2016 年 8 月

社史研究通讯

SHES HI YANJ IU TONG XUN

目 录

Contents

重要文稿

03　《九三学社人物传略》序　／邵　鸿

04　在纪念黄国璋先生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邵　鸿

社史资料选登

07　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

08　总社迁移北平　／笪移今

08　北京分社早期社员名录（一）

口述史

16　祁龙威先生口述史节选（三）　／王世铎

昨天与今天

21　深切的怀念

——纪念孙承佩百年诞辰　／骆　瑛

23　回忆王文元领导的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工作　／张化本

26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 写在茅以升诞辰 120 周年之际　／眷建军

专题研究

28　《九三学社简史》（2015 年版）修订说明　／社中央研究室

30　九三学社总社迁北平考　／乔发进

目 录
Contents

社史大家说

37 褚辅成与中共创始人的交往与友谊 ／王天松

41 《牟小东文集》编后记 ／李 书

社史人物

46 黎锦晖（1891 — 1967）

47 徐采栋（1919 — 2016）

48 谢家麟（1920 — 2016）

49 傅璇琮（1933 — 2016）

消息与动态

50 “谢家麟星”命名仪式在京举行

50 我社 52 名社员喜获 2015 年度国家科技奖

50 茅以升诞辰 120 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行

50 王选纪念陈列室“创新历程厅”揭幕

51 谢家麟同志逝世

51 九三学社中央组织建设研究中心成立

51 九三学社 2 名社员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51 社北京市委举办“九三学社先贤”肖像画展

52 徐采栋同志逝世

52 王宇田同志逝世

52 九三学社 6 名社员和 2 名社员率领团队荣获 2016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

52 纪念黄国璋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九三学社人物传略》序

邵　鸿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也是九三学社创建70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纪念这个特殊日子，缅怀和彰表九三学社先贤，推动我社社史研究、宣传和思想建设，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组织编写了《九三学社人物传略》（以下简称《传略》）第一辑，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九三学社有着光荣历史和众多的杰出先贤。他们热爱祖国和人民，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努力奋斗，无私奉献，始终不渝。他们的人生道路和历史命运给后人以深刻启迪，他们的卓越贡献和崇高风范激励引导后来者见贤思齐，踵武前行。研究、宣传他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加强我社自身建设，继承传统，凝心聚力，更好发挥政党职能的必然要求。为了加大九三学社历史研究和宣传的工作力度，在韩启德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九三学社中央从2006年开始启动了“九三学社社史工程”。近十年来，通过全社上下的共同努力，社史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传略》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成果。

我以为，《传略》较为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有三：

一是首次对九三学社创社前辈做了群体性的介绍和展现。

虽然以往已有一些关于社史人物的文章和传记著作，但在我社历史上，社史人物传略的编撰出版尚属首次。《传略》第一辑共收入我社创社先贤20人，包括许德珩、褚辅成、张西曼、梁希、潘菽、税西恒、吴藻溪、黄国璋、张雪岩、王卓然、涂长望、笪移今、卢于道、何鲁、黎锦熙、金善宝、谢立惠、袁翰青、孙荪荃、王造时。他们不仅是九三学社的缔造者和早期核心成员，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此次将他们的传略集中编纂出版，可谓展现了一组风华各异而又厚重协调的历史群像，不仅使我们能够深化对各位创社先贤生平事迹的了解，更可以由此深刻认识到，九三学社的创立和发展，是一个追求民主、致力科学的爱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选择和事业，也是历史大趋势下的产物。

二是坚持求真求信，力求客观记述、还原历史真相。

文革以前，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九三学社的社史叙述既受制于左的意识形态，也缺少真正的研究，因而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若干史实不清，一些重要成员的作用、地位被忽略，有的历史被回避甚至改写。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得益于思想观念的解放和研究工作的深入，社史研究有了很多新的突破。不仅使一些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被埋没或忽视的前贤如褚辅成、张西曼、张雪岩、王卓然等人的事迹得到发现和彰显，而且发现和纠正了一些以往社史著述中存在的错误。《传略》继续了这一取向，注重从历史实际出发，首次为吴藻溪、黄国璋、孙荪荃、笪移今、卢于道等人立传，填补了社史的空白；而且通过各创社先贤的历史叙述，实事求是地复原和修正了社史的许多细节，并给予更贴切的评价。比如“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实际情况，解放战争时期九三学社总社的设置和各地方组织的活动，褚辅成、张西曼、吴藻溪、黄国璋、孙荪荃等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九三学社的贡献等，在《传略》中都有更合乎历史实际的叙述。

三是注重史料发掘，充分体现和吸收最新研究成果。

《传略》的作者中，有的本人就是相关人物的研究专家，比如王天松同志，以近二十年之力，刻苦搜辑褚辅成的生平史料，著有《褚辅成先生年谱长编》、《褚辅成文存》；张小曼女士数十年如一日，在国内外发掘寻找父亲张西曼的各种著译和历史资料，有多项重大发现；陈建明教授和王京强博士承担了国家级课题，对张雪岩生平广蒐博采，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撰有二十多万字的《张雪岩传》。由他（她）们来写各位先生的传略，自然是厚积薄发，扎实可靠。很多作者虽非专门研究者，但注意深入发掘利用第一手资料，比如笪移今、卢于道传略的作者季萍、张晓鹏同志，直接查阅了传主的人事档案，并做了不少口述史料采集；吴藻溪、王卓然、黄国璋传略作者郭祥、王世铎、李书同志，则通过

与传主家人的密切交往和联系，获得大量可贵的文字、实物和口述资料。其他传略作者，也多能注意尽量利用近年来学术界和我社社史研究的已有成果，保证写作质量。因此，即使从专业角度看，《传略》也可说达到了一定水准，具有历史学的学术价值。

总之，《传略》是贴近历史真实，具有教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一部著作。《传略》和最近刚刚出版的《九三史话》、即将出版的《九三学社简史（修订版）》一起，既是对两个“七十周年”和九三学社各位先贤的献礼和致敬，也为世人了解九三学社，为我社更好地开展社史学习和教育，加强思想建设提供了帮助。它的出版，正逢其时，令人高兴，值得庆贺。

当然，《传略》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因为时间仓促和研究不足等原因，《传略》第一辑未能立传的创社前辈还有不少，文中也存在叙述不够深入、史实不尽一致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地方，还有的传略文字不甚理想，等等。希望在下一辑出版时，这些不足能够得到改变。为此，也希望读者朋友不吝赐教，以便我们改进。

谨序。

2015 年 6 月 28 日

（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

在纪念黄国璋先生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邵　鸿

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召开座谈会，纪念黄国璋先生诞辰 120 周年。我谨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对黄国璋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并向黄国璋同志的亲属致以衷心的问候。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追忆黄国璋先生奋斗的一生，传承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内心一时难以平复。黄国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学术活动家、知名爱国民主人士。黄国璋先生 1896 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湖南湘乡。少年时代先后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驻省中学，与毛泽东两度同学。1919 年毕业于著名的教会学校——长沙雅礼大学，毕业后任该校中学部英文、地理教员兼教务长。1926 年赴美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刻苦勤奋的他成为上世纪 20 年代我国留美学生中专攻地理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人。1928 年 10 月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其间，于 1934 年率云南地理考察团赴滇南地区进行考察。1936 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1940 年赴重庆北碚筹建中国地理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1943 年兼任中央设计局设计委员、区域设计组组长。其间，于 1944 年底与许德珩、潘菽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成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此后曾担任九三学社第一届、二届中央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46 年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0 年当选中国地理学会首任理事长。1952 年调任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1966 年 9 月 6 日因“文革”迫害含冤去世，终年 70 岁。

黄国璋先生是我国地理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吸收引进西方先进的地理学思想和引导我国地理学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黄先生既是一位有重要成就的学者，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地理教育家。他的一生主要从事地理教育工作，是我国近代高等地理教育的发起人之一。他总结了地理专业教学特点，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学术思想和教学方法。这些学术思想和教学方法对地理学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直至今天，对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和高等地理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黄国璋先生又是一位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作为“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发起人和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并受毛泽东同志嘱托，积极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的筹备工作。

黄国璋同志一生以科技和教育兴国为己任，为我国地理学的进步和地理教育的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做出了突出贡献，无愧为知识界的楷模。他的爱国情怀和人格魅力，深深铭记于我们心中；他的崇高品质和坚定信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务实作风和奋斗精神，始终鼓舞我们奋勇前行。

我们怀念黄国璋先生，要学习他胸怀祖国、奋发图强的爱国情怀。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是黄先生毕生之信念。早在在雅礼大学中学部任教时，因接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德国学者洪波德等人的地理学著作，黄国璋从中悟到若要以身报国，为国图强，首先要了解国家，为此，他立志赴美留学研习地理。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以后，他毅然放弃了优厚的物质待遇，谢绝了亨廷顿教授挽留他在美国继续科研的好意，选择回国去施展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黄国璋认为，热爱自己的国家，必先了解自己的国家，而地理学天然具有这一功能。“在地理学家的眼里，地理不仅仅是一个沙盘，它牵连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历史、经济、民生、民俗。我的祖国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统治者无心科学，连版图都绘得错误百出，家底不知，民事不晓，谈何图强？”青年黄国璋如是说，也是这样做的。1934 年 10 月至翌年 6 月黄国璋领导云南地理考察团入滇考察。在当时贫穷落后、交通闭塞、瘴疠肆虐的滇南地区，考察队一行人在黄国璋教授的率领和指导下认真调查农业地理，获得大量宝贵的热带资源、农业地理、边界形势、民族历史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考察回来后，他撰写了《滇南人生与自然》、《滇南之边疆情势及今后应注意之点》，指出滇南地区“关系我国目前抗战及未来国防”，并从“边疆形势”“边区情况”“边民特性”“边防要点”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滇南边疆在地理上的重要位置，以及打通滇缅交通、发展边疆经济对于巩固国防的重大意义。事实证明，黄先生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获得国际援助，支援前线，国民政府急需开辟西南通道。黄国璋一行的考察成果恰恰为打通西南滇缅通道提供了基础数据。

黄国璋先生的一生充分展示了我国科学工作者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回国以后，他积极参加欧美同学会和科协活动，广泛联系海外华侨华人知识分子，以无私赤诚的爱国之心感染鼓励他们为报效祖国献计出力。留美归来的周廷儒、万方祥等专家学者就是黄国璋先生想方设法聘请到北师大任教的。1951 年 6-10 月，黄国璋指派周廷儒等参与当时由铁道部组织的集(宁)白(城)铁路选线调查工作，调查取得了铁路沿线大量的自然和经济地理资料，为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建设铁路选线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今天，我们正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更加需要学习黄国璋同志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把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福祉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们怀念黄国璋先生，要学习他注重实践、知行合一的科学理念。黄国璋先生是地理野外考察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对于一门科学的发展同样重要，地理学要发展要创新就要在实践中验证并不断提升理论。为此，黄先生在地理学研究和教学中尤为强调知行合一，坚持实地调查与学习研讨并重。继 1934 年滇南考察之后，1939 年 5 月至 1940 年 1 月，黄国璋先生在西北联大任教时，克服了诸多恶劣的战时条件，翻山越岭，艰难跋涉，率川康地理科学考察团考察了人迹罕至的川西高原的地质地貌、地理环境、森林资源、民族宗教等诸多情况，填补了该地区地理研究的空白。如果说滇南考察留给后世的是研究 30 年代滇南地理的第一手资料，那么川康考察则奠定了西康地区区域地理研究的雏形，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借鉴。40 年代初他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时组织了对嘉陵江流域的多次考察和对汉中盆地、秦巴山地的科学考察，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建国后，即便在离开躬耕多年的北师大，调任原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之后，黄国璋先生毫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从事着教学和科研工作。1959 年夏他还亲自带领师生 200 多人赴陕南城固县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渭水河流域综合考察与规划”的生产实习，完成了 28 万字的全流域规划并附有地质、地貌等 8 个专项查勘、调查报告。正是凭着一贯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亲身实践的工作作风，正是基于这些亲力亲为的艰苦实践，黄国璋先生开创的这条躬身实践的地理科学创新发展之路，千古不废，永省后人。

我们怀念黄国璋先生，要学习他无私奉献、薪火相传的宽广胸襟。黄先生既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也是一位专心敬业、思维敏捷、长于管理的教育家。从他 1928

年底到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直到1966年9月故去，先后主持过7所知名大学地理系，其中有4所是由他首创，先生也因此成为国内创办大学地理系最多、担任地理系主任时间最长的第一人。黄国璋先生之所以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管理者和改革者，源于他自己就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他开创性地有选择地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地理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引入地理系，介绍西方先进的地理科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在师大的课堂上，他先后讲授过人生地理、北美地理、地理学原理、外国经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等课程，他业务精深，语言风趣，理论联系实际，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因此不管他在哪里任教，都受到学生一致好评和欢迎。

黄国璋先生认为，要办好地理系，首先要保证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他到北师大不久，就多方聘请优秀教师来系里任教。由于他治系公而忘私，没有门户之见，当时许多著名地理学家都应邀先后来到北师大兼职授课。他不仅把著名专家学者请到校园里传授知识，还把系里优秀的年轻教师选派到中学去实践，耕耘播种，以期总结经验和发现人才。他认为要弘扬和发展地理教育，就应该从改革中小学地理教育做起。结果效果显著，许多听过课的学生都称赞内容新颖，引人入胜。不少中学生受其影响，后来就报考地理专业，立志从事地理研究和地理教育工作。黄国璋先生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因材施教，对于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和学生，他亲自联系送到国外大学深造，我国许多著名的地理学家，如任美锷、李旭旦、王德基、徐近之、刘培桐、薛贻源、郑象铣、褚亚平、王树声等都曾受教于黄国璋。黄先生毕生把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经验作为一名老科学工作者的义务，这种不遗余力提携后学的长者风范至今仍让我们深受感动、深受教育、深受鼓励。

我们怀念黄国璋先生，要学习他热爱真理、追求进步的民主精神。黄先生不仅热心地理学会的公众活动，也非常关注并投身于整个科学界的民主活动。在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全国“争民主、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浪潮中，黄国璋等进步教授纷纷参加并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多次参与签署《呼吁和平宣言》。1948年黄国璋态度鲜明地拒绝国民党当局胁迫离开北平去台湾。他以北师大理学院院长和地理系主任的身份，坚守岗位，和广大师生一起保护校系财产，直至迎来北平的和平解放。

黄国璋先生积极参与创建了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黄国璋是16位理事之一。在九三学社第一届理监事联席会上，被推举为常务理事，他还担任了九三学社第一届、二届中央理事会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后，他常和许德珩、劳君展、潘菽、严济慈等定期聚会，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共商天下大事。1949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北师大教工宿舍与师友聚会时，一直负责九三学社组织工作的黄国璋向毛泽东汇报了九三学社发起、成立经过及迁到北平以后开展活动的情况。毛泽东认真听取，希望并要求九三学社的朋友们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建设继续努力。黄国璋没有辜负毛主席的重托和期望，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建工作和九三学社的发展建设工作并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和贡献。九三学社有不少黄国璋先生这样的先贤同中共领导人保持了很好的友谊，不管时局如何风云变幻，他们都把国家富强、民族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毫不动摇地信任并追随共产党。黄国璋就是这样一名学者，这样一名科学家，这样一名始终在路上的追随者。黄国璋先生作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对于九三学社的建立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应当始终铭记。

同志们，朋友们，今年是黄国璋先生诞辰120周年，而黄先生离开我们业已50年了。50年来，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前进，时代在不断进步。我们深信历史的评判必将是公正的。2016年5月17日，“文革”爆发50年之际，《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宣称历史证明改革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党和国家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

同志们，朋友们，以黄国璋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时刻铭记黄国璋先生的崇高风范，不忘昨日的来处，认清明天的去向，传承黄先生“一片丹心照方隅，满腔心血付桃李”的人生境界，秉承爱国为民、求实奉献的人生信念，在无限宽广的民主与科学的道路上，谱写出我们精彩纷呈的人生。

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

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1]

敬启者：在平社友于五月四日本社成立周年纪念之辰，曾集会庆祝，爰经全体决议，向我各地全体社友共申贺意，并奉告数事：

（一）在平社友自去冬迄今，集会座谈，不下十次，几于每半月即举行一次，藉以交换意见，并检讨国内外情势。

（二）一月间之政协周年纪念，三月间之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及五四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均曾发表宣言（三宣言全文附后），尤以本年四月北平当局任意于夜间藉清查户口为名，拘捕各界人士达千余人，激起公愤，曾以本社社友为基干，策划发表北平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引起国内外之普遍注意与反应，可谓为本社北平社友半年来重要工作之一。

（三）在平社友除由渝复员北来者外，数月来并邀请志同道合者加入，藉以增强本社之力量，计有北大教授薛愚、杨人楩，师院教授鲁宝重，副教授叶鼎彝，中国学院教授王彦文五先生。

（四）本社自抗战获胜后在渝社友分散各地，因之联系上颇感困难。日前上海社友曾提议以北平为本社总社所在地，不卜尊意为何，即请于附表上填注意见，以凭公意决择。

（五）本社理监事按章每年改选一次，兹值成立周年，特制附选票一纸，即请按照所附各地社友名单，用双记名方式，于六月廿日前寄达北平国立北京大学许楚生先生收，藉冀如期汇集开票，决定人选。

（六）同人认为本社分子应重质不重量，以后各地介绍新社友时，须经慎重考虑，经多数同意后，再行请其加入，用特录案，以供参加。再者，贵社友对于本社社务有何意见，并请一并示知为荷。此致

社友

九三学社在平社友仝启

卅六．五．四

	社友	签名／盖章
（一）理事　人：		
（二）监事　人：		
（三）本人赞同总社设在		

注意：

（1）理监事连选得连任。

（2）总社理监会以能平、京、沪、渝各地均有社友参加为宜，俟总社社址决定后，其他各地社友当选为总社理监事者，可委托总社所在地之社友代表参加集会，而其本人则负责总社与居留地间之联系事宜。

（3）赞同总社设在某地址，即请于上述第三项下加注该地址名。

1. 原信没有标题。标题为编者根据内容添加。原件扫描图见本册图页。

总社迁移北平[1]

笪移今

抗战胜利后，原在北平任教的社友如许德珩、黎锦熙、黄国璋、袁翰青等均纷纷回平。约每半月即举行座谈一次，交换对时局意见，发表文字，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行。尤以十三教授宣言，引起国内外的极大注意。在此期间，更吸收了许多新社友，如北大教授薛愚、杨人楩，师大教授鲁宝重、叶鼎彝，中国学院教授王彦文等。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本社成立周年日，北平社友集会庆祝，曾决议征求各地社友意见，决定总社所在地。结果多赞成北平，遂将总社由渝迁平。

北京分社早期社员名录（一）[2]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服务机构	住址	社内职务	备考
许德珩	男	62	江西	政协全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代主任，北大校委会常委	慈惠殿甲二号	主席	
梁　希	男	71		林业部部长		副主席	
薛　愚	男	54	湖北襄阳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	西什后库菜园胡同三号	北京分社主任委员	
袁翰青	男	48	江苏	商务印书馆编审部主任		中常委	55.10.27转西安。56年8.2由西安转京。
涂长望	男	40		中央气象局局长		总社秘书长	
李毅	男	32	四川	九三学社副秘书长	后门慈惠殿1号	副秘书长	
孙承佩	男	37	山东桓台	光明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石驸马大街	中常委	
初大告	男	55	山东莱阳	外语学校英文组主任教授		中央委员	
黎锦熙	男	64	湖南湘潭	政协全委会委员，师大国文系主任	西单大辞典编纂处	中常委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方　亮	男	40	江西	北大医学院教授		中常委	
裴文中	男	51	河北	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长	南锣鼓巷20号	中常委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科学院古骨脊椎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 这是笪移今关于总社移往北平的回忆。原件扫描图见本册图页。

2. 在收集整理社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社史资料，包括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早期社员的名录，登记时间大多截止于1958年。这些史料见证了社组织建国初期蓬勃的发展势头，也能从中挖掘出许多被忽略的杰出社员。为了便于全社了解、利用这批资料，我们计划将社员名录遂件整理出来，及时刊发。

叶丁易	男	39	桐城	师大国文系教授	石驸马大街	中常委，副秘书长	54年1月转苏联。已故。
董渭川	男	52	山东邹县	师大教育系教授，实习委员会副主委	东顺城街48号师大宿舍	中常委	
劳君展	女	52	长沙	高等教育部研究员	慈惠殿甲二号	分社副主委	
王心正	男	46	平原	师大地理系教授	龙头井26号		
鲁宝重	男	51	河南	师大化学系教授		中央委员	
刘及辰	男	48	河北定县	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局编审	小雅宝31号	中央委员	（财经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副主任
俞平伯	男	53	浙江	北大国文系教授	朝内老君堂19号		
蔡枢衡	男	48	江西	法制委员会专门委员	府学胡同北大宿舍		
谌亚达	男	46	江西	师大地理系教授	和外东长街131号		
唐悦良	男	64	广东	外语学校教授	东西大淹通胡同6号		56年故去。
唐亚伟	男	39	湖南衡山	亚伟速记学校校长	砖塔胡同		
吴乃立	男	47	安徽	劳动部研究员	厂桥劳动部工资司		
金　涛	男	65	绍兴	清华大学教授	照澜院1号后门酒醋局13号	中央委员	
李光荫	男	48	察省	北京医学院教授	北沟沿翠花街3号北大宿舍		
朱增祥	男	54	江苏	重工业部汽车工业局工程师	交道口土儿胡同		53年11月27转天津拖拉机制造学校
孙荪荃	女	50	安徽	政务院参事	西单崇善里5号		民盟盟员（55年查明）。
韩寿萱	男	51	陕西	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朝内小街什方院甲三号		
王毓铨	男	42	山东	北京历史博物设计员	东四头条41号		
胡先晋	女	41	湖北	民族学院研究部研究员	东四头条41号		
薛贻源	男	40	福建	内务部民政司研究员	部内		
胡　明	男	45	江西	师大政经学教授	西单崇善里5号		54年6月退社
高其冰	男	52	平原	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教授	东城中剪子巷11号		
陈明绍	男	38	广东	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副局长	灵境胡同40号	分社秘书长	
郑象铣	男	37	安徽	铁道部专门委员	东四南小街大方家胡同26号		50年11月25日入社。
杨德馨	女	32	浙江	协和医学院实验员			同上

周学庸	男	40	四川	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科长	西单屯绢胡同 25 号		同上。53 年 6 月 26 调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央电工局教育处校政科。
金瑞莘	女	35	皖北	师大地理系讲师	北新华街 11 号		同上
孙震涛	男	48	河北	北京工业学院教授	西四小绒線胡同 26 号		同上
陈方济	男	61		农业部土壤肥料处处长	东单水土利用局		同上
胡文澂	男	35	沈阳	重工业部北京工业试验所研究员	西留题胡同 11 号		同上。56 年 4 月 23 调沈阳。
邵一麟	男	32	北京	清华大学助教	大方家胡同 3 号		同上
刘翰生	男	33	河北	清华大学副教授			同上
袁恩熙	男	35	北京	清华大学讲师			同上
杨曾艺	男	43	江苏	清华大学副教授			
滕智明	男	26	江苏	清华大学助教			
陈文彬	男	49	台湾	文化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			
田世英	男	40	皖北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部地理组长			
汪先步	男	43	安徽	林业部宣传编审科科员	东四六条八宝胡同本部		1950 年 12 月 8 日填表。1959.8.14 调内蒙博林线。
何家泌	男	39	福建	农业部特产处副处长	东城金钱胡同本部		
冯家昇	男	49	山西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研究员	东城王府大街本所		
章新民	男	48	江西	中央卫生研究院图书馆主任	黄化门甲五号		51 年 1 月 25 日通过
储安平	男	42	江苏	新观察杂志社记者	阜城门内宫门口东四十号对门		51 年 1 月 19 日通过。
孙云铸	男	56	江苏	地质部教育司司长	沙滩中老胡同，北大宿舍		同上
沈令扬	男	43	浙江	国立北京图书馆日文组管理员	南池子十三号		同上
江镜涛	男	46	安徽	市立十五中学教员	西校石碑胡同本校		51 年 1 月 26 日通过。
艾景海	男	34	河北	铁道部设计局工务员	霞公府本部		51 年 2 月 16 日通过。
杨为方	女	45	浙江	科联科长	中老胡同 32 号		同上
林修灏	男	44	福建	卫生部药物食品检验所技正	黄化门 19 号		同上
魏　璧	女	49	湖南	北大数学系教授	西郊北大东大地 29 号		同上
陶葆楷	男	47	江苏	清华大学教授	史家胡同 29 号		51 年 2 月 23 通过。

尹赞勋	男	50	河北	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			51 年 1 月 25 日在南京通过入社。
孔凡均	女	49	曲阜	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编辑	卧佛寺街 44 号		51 年 3 月 9 日通过。
杜子劲	男	54	河南	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编辑			51 年 3 月 9 日通过。55 年 5 月 21 日死亡。
萧家霖	男	55	江西奉新	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兼秘书	卧佛寺街 44 号		51 年 3 月 9 日通过。
衷　俊	男	41	江西	本社秘书			
黄纪兴	男	45	江西	外交部外语学校法文系教授			51 年 3 月 11 日通过
宋泊	男	39	河北	清华大学讲师			
秦含章	男	44	江苏	轻工业部参事	东四七条 43 号		
孟昭威	男	41	河北	北大医学院生理系教授	绒線胡同 178 号		
杨钟健	男	55	陕西	科学院编译局局长	地安门东皇城根本院宿舍		
曾庆和	男	40	江西	林业部技术员	东四六条本部造林司		51 年 3 月 30 日通过。
毛礼锐	男	48	江西	师大教育系教授	和内西半壁街 28 号		
鲁德馨	男	60	湖北	卫生部技正	南池子箭厂胡同 2 号		
钱宇平	男	32	浙江	北大医学院细菌科讲师			
劳远琇	女	33	湖南	协和眼科医师（教授）	协和医院		
成和慧	女	38	江苏		北河沿 47 号		51 年 4 月 6 日通过。
王云章	男	46	平原	科学院植物分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西直门大街 26 号		
燕鸣轩	男	49	湖北	北京铁道学院政治讲师			
胡德煌	男	42	江西	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	民族学院东宿舍楼下 106 号		
薛培贞	男	42	河北	中国幻灯公司制机部主任	东四六条三号		
余元盦	男	48	浙江	科学院编辑局编辑	西四义达里勤俭巷 3 号		
赵广增	男	37	河北	北大物理系教授	北大中关园 93 号		
赫葆源	男	35	北京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助研员			
杨肇燫	男	53	四川	科学院编辑局编审兼编审主任	西城石板房 30 号		
朱弘复	男	42	江苏	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	西直门大街 263 号		
顾功叙	男	46	浙江	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郑作新	男	45	福建	科学院编审	西城石板房 31 号		
游国恩	男	54	江西	北大语文学教授	燕东园 23 号		
魏建功	男	52	江苏	北大语文教授，新华词典编辑室主任			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张志三	男	33	河北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　璞	男	36	山东	科学院编译局副研究员			
李孝芳	女	35	河北	北大地质地理系副教授	干面胡同 31 号		
王之相	男	62	辽西	法制委员会编辑主任，俄文夜校副校长			国务院参事
叶德光	男	42	福建	中国幻灯公司计划室主任	史家胡同官学大院 5 号		
胡　媄	女	37	江苏	重工业部实验所研究员	菜园胡同 3 号		56 年 4 月 23 日调沈阳。
刘　钧	男	47	河北	中国幻灯公司制片部主任	东四四条 33 号		53 年调天津石油学校
戈福元	男	35	安徽	农业部农业生产司一等技术员	崇内老钱局本部		
沈宪耀	男	47	浙江	农业部农业佛学机械化学院教授			
孟广俊	男	42	北京	生工业部综合工业试验所研究员	大佛寺西街泰安巷 1 号		54 年 2 月 1 日调沈阳铁西区尚武街 18 号。
黄有辛	男	33	江西	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助理	东安门北河沿 47 号		
戴修瓒	男	66	湖南	法制委员会委员			
李祖荫	男	55	湖南	法制委员会委员			
李浩培	男	45	上海	法制委员会			
吴传颐	男	42	苏州	法制委员会			
张楚宝	男	42	南京	林业部计划司司长	本司胡同		
唐伟英	女	33	广东	清华大学化工系讲师			
张宗英	女	52	浙江		后椅子胡同 2 号		
张英侠	女	41	四川	本社干事			
彭道真	女	47	安徽	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处副处长			
孙一青	男	57	山东	师大教授	西单武功卫师大宿舍		
马鸣琴	男	45	辽西	农业部农业科学研究试验所研究处副处长			
任道明	男	52	浙江	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司药械处长	东城贡院西街 5 号		54 年 1 月 22 日调沈阳农业局
张席禔	男	54	河北	地质学院教务长	端王府夹道		

庄圻泰	男	44	山东	北大理学院数学系教授	中老胡同 32 号		
潘钟祥	男	46	平原	北京地质学院教授	北大红楼 472 号		
曹萃文	男	48	山东	重工业部计划司机械组组长	崇内马道厂 5 号		
李克珍	女	27	湖北	北大历史系助教	西郊北大外文系楼历史系办公室		
曾宪华	女	41	武昌	河北省师专教员	南小街什坊院 30 号		
王　序	男	41	江苏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教授	菜园胡同 3 号		
薛公绰	男	39	江苏	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	本部		党员
周延儒	男	44	浙江	师大地理系教授	石驸马大街乙 90 号		
楼邦彦	男	40	浙江	北京政法学院政治系教授			
区学洞	男	61	广东	林业部技术员	宣外永光寺西街北 6 号		
张兰龄	女	37	河北		西直门大街 26 号		冯家昇
冯逖	男	48	北京	廿七中学教务主任	本校		
万希芬	女	26	河北	北大图书馆专修班助教	西郊北大第二体育图书专科办公室		
焦君梅	女	49	江苏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络组干事	府学胡同北大宿舍		
周祖谟	男	39	河北	北大语文教授			
钱学熙	男	47	江苏	北大西语系教授			
尹德新	男	33	河北	师大教务处助教			党员
程绍伊	男	53	四川	卫生部教育处编审出处科技士	喜雀胡同 7 号		
徐诵明	男	62	浙江	卫生部教育出版社社长，北京医学院教授	后门内西吉祥胡同 8 号		
郭可大	男	42	江苏	中央卫生研究院研究员	后门内西吉祥胡同 8 号		
俞德浚	男	46	北京	科学院植物分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西斜街 61 号		
丁　方	男	36	浙江	林业部办公厅宣传编译科副科长	李广桥东街 17 号		
孙崇义	男	44	北京	师大编纂处编纂员	钟山里一号		
王述达	男	48	北京	师大编纂处编纂员	南赛街 15 号		
徐世荣	男	40	北京	师大编纂处编纂员	五显庙 2 号		
高景成	男	35	北京	师大编纂处编纂员	前外甘水井胡同 9 号		

徐幼慧	女	39	浙江	卫生部教育处技师	后门西吉祥胡同 8 号		
王碧书	女	47	河南	故宫博物院群众工作部	朝阳门大街 83 号		
羡书锦	男	43	河北	重工业部化学工业局生产建设处工程师	东城大方家胡同六号		
李由义	男	29	浙江	政法委员会			
黄　瑾	女	36	沈阳	科学院编译局编辑	东四什锦花园吉祥胡同 15 号		
李　沄	女	28	天津	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技术员	西郊公园本所		
刘友樵	男	31	福州	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交道口南大街 55 号		
邓国藩	男	32	广东	科学院昆虫研究室助理员			
谢荫荣	男	41		中央燃料部干部学校教师	东郊定福庄中央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		55.2 转长春。
金克木	男	41	安徽	北大东方语教授			
陈一霆	男	38	江宁	科学院编译局编辑	西四北大街太安侯胡同 16 号		
郭梃章	男	35	福建	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大佛寺西街泰安巷 1 号		
苑毓英	男	39	河北	华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设计处标定科工程师			
张彤华	女	33	重庆	林业部计划司代理副科长	东四六条八宝胡同本部		
张　昭	男	41	辽西	林业部造林司司长	东四八条 106 号		党员
李万新	女	38	吉林	林业部森林工业司副司长			党员
唐进武	男	41	四川	卅一中教员			
沈达明	男	39	上海	中央贸易部中外贸易司研究员	和内西半壁街 19 号		
王天一	男	36	江苏	科普科学大众杂志社总编辑	东单新闻路大土地庙 16 号		
鲁一同	男	29	江西	林业部宣传编审科编辑			
叶恭绍	女	44	广东	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副主任兼妇幼卫生科主任	东城内务部街甲 39 号		
李儒勉	男	52	江西	文教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局编审处处长			56 年 8 月 2 日死亡
袁昌国	男	34	山东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技正			
许容儒	男	36	浙江	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副工程师	西四礼路胡同 43 号		
孟昭赫	男	32	辽西	北京医学院助教	王府井大街 43 号		

朱洪之	男	35	江苏	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大佛寺西街泰安巷 1 号		
王淦昌	男	45	江苏	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邓稼先	男	28	安徽	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金星南	男	32	江苏	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张宗炳	男	38	杭州	北大动物学系教授			
孙曾培	男	31	绍兴	卫生部药物食品检验所副技师	黄化门 19 号		
袁士诚	男	36	江苏	卫生部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干事			
夏武平	男	35	河北	科学院动物标本委员会助理研究员	地外冰窖胡同里 2 号		
喻诚鸿	男	30		科学院植物分类所助理员	栋梁厂 25 号		
钟补求	男	37	浙江	科学院研究员	缸瓦市小酱坊胡同乙 4 号		
李继书	男	34	四川	林业部森林工业司副科长	本部		
周慧明	女	37	福建	林业部森林工业司司长	无量大人胡同 14 号		
黄震东	男	38	宁夏	卫生工程局工务处副处长			
武纡生	男	47	河北	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局第五科副科长			
马宗尧	男	36	浙江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	前赵家楼 7 号		
陈逸园	男	50	湖南	人民出版社地理编辑室编辑	小鸦宝胡同 31 号		
梁建兴	男	33	桂林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局编辑	东单大牌		
金宝善	男	60	绍兴	卫生部技术室主任	德胜门大街甲 74 号		
隋树森	男	47	山东	人民教育出版社技术编辑室编辑	东单前赵家楼 7 号		
萧　璋	男	44	四川	师大中文系教授兼副系主任	西四兵马司 22 号		
陈兰英	女	31	四川	协和医院药房代主任			
邓家栋	男	47	广东	协和内科教授兼主任			
裘祖源	男	48	北京	协和教务长兼公共卫生科主任			
盛尔镇	男	37	成都	中国幻灯公司技师	东四四条 33 号		53 年 6 月 26 日调上海中国幻灯公司上海制造厂工作，54 年 5 月 24 日由上海调回，任教北京工业学院

（未完待续）

祁龙威先生口述史节选（三）

王世铎 整理

统战“圣人”孙承佩

1957 年 5 月，整风运动中，李毅去中央统战部参加座谈会。黄绍竑在座谈会上发言，给共产党提意见。李毅听不过去，就在会上发言，与黄绍竑当场交锋。第二天各大报纸报道，把李毅写成了“李翼”。显然不是报纸搞错了，实际是中央统战部有意改的，是为了保护李毅。

社中央机关都晓得这就是李毅的发言。吴铁峰慷慨激昂，说李毅对黄绍竑的反驳，是在妨碍毛主席提出的大鸣大放。后来反右，吴铁峰被打成右派，这也是他的一条罪状。

反右运动开始，社中央机关里一个叫江镜涛的，揭发李毅，非要把李毅打成右派不可。还有个叫张亮的，原是地质部办公室主任，调来九三学社中央任整风办公室副主任。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也要把李毅打成右派。

给李毅定性时，张亮去中央统战部报告。中央统战部听说孙承佩不同意，就没有批准。孙公是长期从地下党过来的人，中央统战部是信得过孙公的。孙公保住了李毅。通过这件事，能看出孙公这个人的份量。别人谁挑得了这样的政治担子？

反右运动中，孙承佩也保了牟小东。牟小东在鸣放时说了不少错话，孙公让他好好检讨，保护牟小东躲过了一劫。

解放前牟小东在北平开个旧书店，解放后，他的旧书店并入了一家出版社，牟小东在里边当头。牟小东在三五反时是“老虎”……遭到斗争，被开除了公职。牟小东丢了工作，是孙公安排他进了社中央机关。

有人也是要把我打成右派的，特别是我记录许德珩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上讲话那件事。

我记录许老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上讲话的经过是这样的：

由于储安平提出，民盟已经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九三学社不能不传达。当晚开会传达时，许老拿个小本本，说几句就看看记录，东一句西一句，不大连贯。衷俊通知我作记录，要我转天把许老的传达整理出来。我没有积极性，因为我想调走，另外记录也不好整理。第二天，衷俊说，民盟已经整理好了，叫他们打印了一份，我借来给你参考参考。我就基本照着民盟整理的传达稿抄了一遍。吴铁峰让我在稿纸上誊写好，送到水产部，请许主席审阅。

那时，许德珩主席每天上午到水产部上班。许老用毛笔一张一张地改，改了两遍，毛主席说的“我建议撤销高校党委”那句话，都没有改动。然后许主席签发，传达到全社。下边有人得知毛主席要撤销高校党委，兴高采烈。后来追查，九三学社哪里来的这个文件？许多人因此被打成极右派。

这时，我已经回到扬州，《社讯》交给了一个姓苏的大学毕业生接办。他寄信来问我：许老的传达稿是你整理的吗？有问题了。

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许老检讨了 20

多分钟。

因为这件事，要把我打成右派。也是孙承佩不表态，保了我。如果我被打成右派，我的这个家，还有我的两个儿子，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情况……想起来真是可怕啊。

后来，青莱藻见到我说，如果你一直留在社中央机关，就会像我一样（反右运动中，青莱藻也被打成了右派）。青莱藻这个人比较好。

与牟小东同在科技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江镜涛，跟随吴铁峰反对李毅，又给许主席写大字报，反对许主席。后来一查他有问题，被九三学社中央清理出去了。

吴铁峰戴了右派帽子，他的肝有问题，死在家里。

储安平“党天下”的言论，各大报纸登出后（按：1957 年 6 月 1 日，储安平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6 月 2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给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九三学社中央机关议论纷纷，不少人拍手称好。

孙公把我叫到北京市文化局，问我，机关对储安平的发言有什么议论？我说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孙公说，你自己怎么看？我没说话。孙公说，（储安平）这话是错误的呀！下面看看还有什么话出来——我很感谢孙公在关键时刻及时点醒。

上世纪 50 年代，我与孙承佩起初不过是工作上的交往，没有思想上的交流。

反右运动中我到北京，曾经去过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机关院子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主要是批判汪达识的。汪达识是社中央组织部的干部，楚九英的部下。汪达识对党有意见，说了些错话，后来被打成右派，清理出去了。再有，就是批判许老的。

李毅见到我，一如既往，很亲切，还把北京的情况跟我说说。孙公见了我不大说话。下班时，一部车子送孙公、李毅、楚九英三个人回家。我在北京借住在一个朋友家，顺便搭他们的车回去。李毅、楚九英下车了，车上只剩下我与孙公，他也没说什么话。估计那时孙公对我与储安平的关系，还没有一个清楚的鉴定。

这时，王之相离开了社中央机关，李毅恢复了社中央副秘书长的职务。我在扬州与社中央联系，通信通电话，都是找李毅，没有跟孙公建立联系。

上世纪 60 年代，我到北京中华书局搞《张謇日记笺注》，再去社中央机关，我就是客人了。李毅在北京分社那个楼上下来，楼梯上见到我，很高兴，请我到同和居去吃饭。过了几天，我再去社中央机关机关，孙公见到我，客客气气，也说要请我吃饭。那时对机关领导都称先生，我对孙公辞谢说：“李先生已经请过了。”孙公还是坚持要请，又去了同和居。

文革中，孙承佩因搞新编历史剧《官渡之战》和《唐太宗》（按：孙承佩于 1955 年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为了繁荣京剧艺术，工作之余创作了剧本《官渡之战》，由北京京剧团的著名演员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主演，成为北京市向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庆献礼节目之一。后应马连良、裘盛戎之请，孙承佩又创作了剧本《唐太宗》，未能排演）挨批斗。一次把孙公弄到中山公园召开大会批斗。吴晗被造反派押来陪斗。临散会，孙公与吴晗对视了一眼，那是孙公看到吴晗的最后一面。

文革后期，1975 年我去光明日报写一篇文章，住在光明日报社虎坊桥那边的宿舍，离孙公家比较近，三天两天去看他。这时孙公已是满头白发。他香烟不吃了，沙发旁边放个小桌，桌上放着二锅头。没事时，他会喝一点白酒。我去了就陪他吃吃小酒。

自 1946 年至 1979 年，孙公的家一直住在西四东铁匠胡同，三间平房，里间卧室，外间会客。没有取暖和卫生设备，院子里围了个露天厕所。孙公的小儿子比较顽皮，经常爬到屋顶上去玩。孙公的居住条件非常简陋，在北京是中下等的住房。从新中国成立，孙公就是《光明日报》社总编室的负责人之一。报社和全国政协几次要给他调房，都被孙公谢绝了。他与夫人骆瑛带着三个子女，在简陋的平房里住了整整三十三年。

孙承佩的夫人骆瑛，是《光明日报》文教部副主任，党龄比孙公长。文革初期也受到批判，处境艰难。

1943 年，孙公到重庆任《新蜀报》主笔。骆瑛经孙伏园先生介绍进入《新蜀报》。与孙公相识时，骆瑛已有五年党龄。骆瑛在重庆从事地下党工作，她的直接领导是重庆《新华日报》社的石西民。孙公与骆瑛在重庆结婚，石西民是他们的证婚人。孙公 1946 年加入九三学社。1947 年由徐冰介绍，孙公在北平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石西民当过文化部长。石西民有个老部下叫陶白，原来是江苏省委的，文革后住在我们扬州师范学院里。他得知我要去北京，托我带给石西民两罐花生米，请我代他去看望看望。我到北京看望过石西民，那时石西民刚被解放，主持出版局工作，住在部长楼。

我有朋友在文物局工作，他们在王府井请我吃晚饭。席间说起一个情况：文物局长王冶秋每天挂吊针，这两天不挂了，天天跑周总理住的医院，明天晚上李先念副总理接见外宾的外事活动也取消了……根据这些征兆推断，恐怕是周总理的病情危重了。第二天一早，听到广播哀乐，知道周总理去世了。整个北京城的空气顿时变得非常压抑，人们的心情非常悲痛沉重。

我去东铁匠胡同看望孙公，孙公夫妇刚向周总理遗体告别回来。孙公说，许老去向总理遗体告别，见到邓颖超邓大姐，失声痛哭。许老说，我的肠癌是周总理关怀帮我治好的，我没死，想不到总理却先走了……

孙公家里冷冷清清，炉子也没生火。孙公说，晚上没心情做饭了，我们两个到外面去吃吧。孙公与我到西单的江苏饭店吃的饭。服务员也都没有心思服务，都在看总理逝世的报纸。饭后，孙公带回几个菜给骆瑛。

孙公家里有个黑白小电视机。晚上，我俩不约而同地站在那里，看着电视机里追悼周总理的画面，悲恸不已，相对痛哭。我们不是在哭自己，而是在哭国家。

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与孙公彼此打开了心扉，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从此，我和孙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过了几天，我去天安门广场，与北京市民一起泪送总理的灵车。回去也向孙公报告了。那时，我与孙公都有一个信念，就是坚信共产党正确的方针政策总有一天会恢复，民主党派总有一天能够重新发挥作用。于是孙公与我谈到九三学社今后的问题，谈到九三学社的将来。当时，九三学社老一辈领导人几乎都还健在。各民主党派中，我们九三学社领导班子保持得最完整。但是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干部，却是死的死，散的散。

本来张英侠的位子在楚九英之上，但是，薛愚被打成右派，张英侠也惨了。我去九三中央机关颁赏胡同看过，天井里恶草丛生，长得有半人多高。南边的厕所，所有的水管都锈坏了。文革中，薛愚与张英侠夫妇被扫地出门，此时寄居在颁赏胡同院内北屋一间房内，其他房间堆满了桌椅橱柜。薛愚告诉我，他已经 80 岁了。看到这番凄凉情景，我产生了一个观点，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共产党遇到挫折，我们民主党派也跟着遭难，跟着倒霉。

九三学社恢复活动，召开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前（按：九三学社恢复活动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为 1979 年 10 月 11 日在北京召开的“九三学社第三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1978 年孙公把我召到北京，让我执笔起草大会《工作报告》。这个《工作报告》要涉及文革前后，要回忆九三学社在文革中的那段经历，我就运用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观点。这也是 1984 年孙公让我撰写社史的前奏。

民主党派刚恢复活动时，都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集中办公，地点在沙滩。九三学社中央只有一室一厅。那时，牟小东正在给许德珩写回忆录。我听孙公跟牟小东说，这次中央委员要安排启功先生了。

当时我大儿子在清华大学教书，我先是住到清华大学招待所起草《工作报告》。后来，朋友介绍我住到军事科学院的招待所，那里条件比较好些。

那个《工作报告》不好写，许多社员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死去，死得很悲惨。看到那些材料，真是触目惊心。《工作报告》反复磋商，反复修改，翻来覆去，写了两个多月。我写一段，先送李毅看，跟李毅推敲，什么地方怎么改。改后，再给孙公看。孙公提出修改意见，再改。差不多了，再召集少数人开会讨论，修改。最后呈给周培源副主席审阅——这次大会是请周培源副主席作《工作报告》。

我写的《工作报告》中有一段话，自己比较满意，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顶住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淫威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大家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周培源副主席宣读完这句话，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会上只有魏建功先生显得灰溜溜的，一点笑容也没有。文革中魏建功先生追随江青“四人帮”，他在九三

学社中央委员选举中得票最少，勉强当选。

1982 年，社中央在青岛开会，讨论高等教育问题。孙公发话，要我去参加。在青岛，晚上孙公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想把我调到社中央。

我感觉社中央机关里的事情复杂，不好办。上世纪 50 年代，反胡风和反右，两次运动我都是离开了上海、北京两个大城市，幸免于难。1956 年调到社中央工作，碰到储安平。如果不是李毅、孙公帮我，与储安平的关系就说不清——我感到高处不胜寒啊。我不想去北京……

我注意到，这时周培源副主席的观点已经改变。有一次开会，周培源参加我们小组的讨论，说他过去对毛主席说的话，是句句听，字字听。现在他认为，还是应该相信科学，不能迷信一个人说的话。毛主席搞三线，安排北大迁到汉中，在汉中造了房子。他去汉中看过，以为这回安全了，万无一失了。等到周老与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美国人拿出一张照片给他看，照片上就是北大在汉中的校址，拍得清清楚楚。周老说，科技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再搞三线，再搞深挖洞广积粮，还有什么用？三峡工程他也不赞成上。周老说，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科学。毕竟周老是搞科学的，是研究相对论的。然而，许老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所以不能合拍。

社中央在北京西苑大旅社开会，有个花絮：一天吃过晚饭，上海九三的秘书长王祖骥招呼我说，你听到吗？广播在找你。原来，社中央给许老的慰问信，许老看了不满意。孙公通过广播找我，要我赶紧把慰问信再改改。慰问信是牟小东起草的，我一看，写得像篇公文，过于枯燥了。我就把许老在五四运动和他一生中的光辉业绩，用一两句话写进去，润色润色，稿子再呈许老，许老就不说话了。

每次去北京，我总是去社中央机关看看。我的家乡口音比较重，有人说，祁龙威讲的话我们听不懂。

孙承佩说，虽然我跟他很熟很熟了，但是他说的话，有的我也听不懂。说罢，孙公与大家哈哈大笑。

一般时候，孙公跟我比较客气。但是，也有不客气的时候。内蒙古大学想请我去作报告，火车票送来了。孙公说，就要开全会了，文件工作忙得很，不要去了吧！我没话可讲，只能退票。内蒙古大学的人带了汽车和皮大衣去火车站接我，接了个空。类似这种事，孙公一点也不客气。

我每次到京，孙公都请我到他家。他亲自去到菜市场买两条鲢子鱼什么的，回来烧一烧，请我吃顿饭。

……

我再见到孙公，是北京发生“六四”事件以后。我到北京，社中央派司机小滕开车去接我，然后再去孙公家接他去中央统战部开会。到了中央统战部，孙公下车，看着他拖着沉重的步伐，疲倦的背影，走进中央统战部——这是孙公留给我的最后影像。

1990 年 9 月 17 日，受社江苏省委主委吴桢之托，我还与孙公通过电话，10 月 20 日孙公就去世了。真是“电音犹在耳，讣告欲摧肠”！

社中央召开七大，赵伟之安排我带老伴儿去开会，住一个房间。那次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社中央全委会[1]。就是这次开会期间，小滕开车送我去看望了孙公的夫人骆瑛。

孙公这个人，第一是廉洁。

孙公夫妇住了三十三年东铁匠胡同的房子不用说了，后来他搬到阜外部长楼，家里也没安装空调，只有一个摇头电风扇。买菜都是孙公自己去菜市场，他的生活很简朴。

第二，孙公待人平易，宽厚，没有官气，对社内的专家学者非常尊重，注意团结和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

历次运动中，社内一些专家学者受到冲击，受到不公平对待，孙公总是尽最大可能在生活上给以照顾、关心。例如，启功先生 1957 被划为右派，生活一度极为困难。孙公为了改善启功先生的生活条件，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再如，潘菽老年事已高，他的儿媳在离家很远的一家医院上班。为了方便她照顾家务，孙公亲自与西

1. 应为九三学社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 年 12 月 26 日——30 日召开，选举九三学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祁老是九三学社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城区的负责同志联系，力促将潘菽老的儿媳调到离家较近的单位工作……

1984 年孙公到无锡主持社的工作会议，会后到扬州视察社务。招待所条件比较差，洗澡没热水，还需自己用水壶去打热水。接待孙公的汽车，是一辆市政府将要报废处理给我们的面包车，开起来汽油味道很大。用这样差的条件接待孙公，我的内心很不安。可是孙公却从容自若，毫不介意。

梁希的干女儿叫周慧明，最早在南京林学院，当过社中央的副秘书长，时间很短[1]。现在已经去世了。她跟我讲过一些梁老的情况。梁希是新中国第一任林垦部部长，工作勤勤恳恳，一生没结婚，两手空空，很清廉，也是没有官气，在我们九三学社的威信很高。

王淦昌王老，到了晚年，身体不好，傍晚出去散步，被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跑掉了。公安局要追查，王老说，小孩子撞了人，跑掉了，他也怕了，不要追查了。王淦老是核工业部的副部长，是真正的副部长，对国家核工业贡献那么大，两弹一星元勋，一点官气也没有。

九三学社的光荣传统，就是爱国，用科技报国。这是老一代留给我们的财富。“社史”教育的最大意义，就是不能丢掉我们的光荣传统。

我们建立九三学社，不是为了做官讲排场。自己以权谋私，怎么发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作用？怎么监督执政党？如果我们民主党派讲排场，当官做老爷，搞官僚主义，真是可耻。

回忆这些，其中的意思，就是想劝诫现在社的领导，要保持高尚的品格，要清廉，不要有官气，不要像有的人那样摆官架子，不要总想把子女弄到九三机关来。

什么叫贪污？什么叫官僚？这些在孙公身上都找不到。

孙公去世后，夫人骆瑛编了本《孙承佩文集》。当时我去美国探亲了。等我回来，骆瑛说，《光明日报》留了版面，让我写篇文章。我读了孙公的文集，写了篇纪念孙公的文章《为祖国而奉献终身——〈读孙承佩文集〉》。这篇文章《光明日报》登了，骆瑛与北京《科技日报》比较熟悉，在北京《科技日报》也登了，我们九三学社中央的刊物《民主与科学》也登了。有人戏称是“两报一刊”。我写的诗《哭孙承佩同志》发在《九三中央社讯》上。

启功先生晚年说，孙公的统战工作水平，没人能比得了。孙公逝世，启老敬献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任劳负重沥胆披肝统战奇勋人共仰

公听并观鞠躬尽瘁和衷隐德莫能名

孙公曾有一篇学习茅以升爱国主义精神的文章，标题“忠诚报国，风范长存”。这个标题正好可以用给孙承佩自己。孙公毕生辛劳，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献给了九三学社，献给了多党合作事业。他的为人处世，道德品格，领导水平，真的称得上成“神”成“圣”了。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1. 据 1962 年九三学社第四届委员会秘书长是涂长望，副秘书长是孙承佩，陈明绍，李毅，周慧明。周慧明时为林业部副司长，曾是 1956 年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委员。

深切的怀念

——纪念孙承佩百年诞辰

骆 瑛

参与筹办《光明日报》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兼任北平市长，徐冰同志为副市长。2 月军管会中南海办事处很快接管了华北日报和世界日报。为筹建《光明日报》，中央统战部于 1949 年 2 月下旬委派孙承佩和统战部的吴永英（何叔衡的女儿）、冯烨等（由孙承佩负责）先把世界日报的房屋、设备、印刷厂和后勤人员接收过来。然后在承佩的主持下进行《光明日报》的试刊工作，参加试刊的还有谢公望、徐亦安和黄卓明等同志。他们于 3 月份起开始试版、试刊，用平版机印刷，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试刊任务。

5 月 9 日，《光明日报》筹委会正式成立，由五人组成，他们是：胡愈之、章伯钧、萨空了、孙承佩和林仲易。6 月 16 日《光明日报》正式出版，胡愈之任《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工作人员仅 20 余人。6 月 1 日我到《光明日报》工作，当时设有一个采访部（承佩任主任）、夜班编辑室、校对科和资料室，中宣部调来的吴江（吴寄寒）同志任夜班编辑室主任，谢公望、徐亦安、黄卓明协助吴江工作，冯烨从统战部调光明日报社担任印刷厂副厂长。1949 年 9、10 月间，陆慧年、高天、于友、沈求我等同志相继来到报社，充实了中层干部的领导力量。

1951 年 7 月，举世瞩目的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我国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约 20 名资深的中外记者赴朝采访，承佩以《光明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团前往。他发回的报道多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位置，有的被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1952 年 5 月，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承佩冒着危险，作为《光明日报》特派记者再次赴朝鲜前线采访，以铁的事实揭露了美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证。

1954 年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承佩以《光明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与会，采写了许多有影响的通讯报道，其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内瓦》一则通讯经新华社转发，在全国各大报上登出。

1954 年承佩又兼任《新建设》杂志代总编辑，1955 年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他在担任文化局副局长期间对北京自然博物馆、定陵博物馆和首都图书馆的规划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除此，他还在百忙之余撰写了京剧剧本《官渡之战》。该剧重新塑造了曹操的舞台形象。此剧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富英（饰袁绍）、裘盛戎（饰曹操）、马连良（饰许攸）主演，著名剧作家王雁一导演，著名琴师李慕良谱曲。裘盛戎过去扮演的几个曹操都是传统戏，而这个曹操则是裘盛戎根据承佩的剧本创造的，具有新意。这部戏里的曹操不再是狡诈阴险的白脸奸臣，而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政治家。为适应这种变化，裘盛戎和承佩商量，他扮演的曹操不但在服装、脸谱等方面要作改变，而且在人物出场、唱腔设计等方面都将革新。在《官渡之战》这部戏里，谭富英、马连良都有上乘表演。这部戏在北京（包括在部队）演出 40 余场。该剧是北京市为庆祝建国 10 周年的献礼剧目之一，演出时观众反应热烈，受到广泛的好评。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时，彭真同志亲临观看。马连良、裘盛戎还希望承佩再写一个剧本，他于 1963 年写了京剧《唐太宗》。因北京京剧团演员阵容变化，该剧未搬上舞台。

献身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事业

1958 年承佩调九三学社中央任专职秘书长，此后，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执行局主任、常务副主席，协助许德珩主席、周培源主席主持九三学社中央的工作 30 余年，直到他猝然去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承佩振奋鼓舞，把被迫停止活动 10 年之久的九三学社工作恢复起来。他工作上动脑筋、想办法、挑重担、肯负责任，重新恢复了各地的组织活动，还建立了不少省市新的基层组织。

1983 年他去哈尔滨主持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会后还到齐齐哈尔、长春、沈阳等地调查研究，推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84 年初他到无锡主持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会后到南京、上海、苏州、扬州等地考察社务。1988 年 6 月，他以 70 多岁的高龄，不顾酷暑，赴广州参加九三学社广东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九三学社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1988 年 12 月，他代表社中央在九三学社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发扬民主科学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为题向大会做了工作报告，并再一次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九三学社是由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民主党派，它集中了许多优秀的国内外知名的科技专家和学者。承佩从早年起就与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了解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并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碰到的困难，这是他做好九三学社工作的重要基础。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党员干部，承佩对九三学社内的专家学者如王老（淦昌）、吴老（阶平）和邓老（家栋）等都非常尊重。他常说，九三学社是一个人材荟萃的党派，我们要做好工作，多发挥每一个成员特别是专家学者的作用。

50 年代末，九三学社内的一些著名学者在本单位受到冲击，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承佩总是注意在生活上关心他们，调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著名书法家启功 1957 年受到不公正对待，生活一度极端困难，承佩为改善他的生活条件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承佩关心知识分子和九三同仁们的事例很多。80 年代初，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年事已高，其儿媳在离家很远的一所医院上班，照顾家务很不方便。承佩得知此事后，亲自与当时西城区的负责同志联系，力促将潘老儿媳安排在离家不远的单位工作。承佩对九三学社几位老一辈领导人十分尊重，关系也十分融洽，并注意从政治上关心他们。许老（德珩）、严老（济慈）、茅老（以升）等都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对入党心仪已久，承佩及时将他们的想法向党组织反映，实现了他们多年的愿望。许老 89 岁高龄仍孜孜追求加人党组织，并首先向承佩敞开心扉。1979 年 3 月的一天，承佩去看望许老，交谈中，许老恳切地说“三中全会以后，我对党更加热爱，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我身后能追认我为一名共产党员。”承佩立即向党组织转达了许老的愿望。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对许老说：“你不加入党组织我们也没有把你当作外人，你要求加入党组织，我们表示欢迎。”后经邓颖超、乌兰夫同志介绍，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许老的入党申请。

承佩自 1954 年始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从 1959 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达 23 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参加或带领政协考察组赴地方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或提出工作建议，他也曾参加政协代表团赴国外访问，推动了政协与国外对等机构的联系工作。他在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时，常为起草、修改政协工作报告而废寝忘食，在担任政协工作组办公室、学习委员会和提案委员会负责人期间，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工作，成绩斐然，为党的统战和政协工作做出了贡献。

老党员的毅力与品格

承佩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不向组织上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从 1946 年冬至 1979 年，我们一直住在西单东铁匠胡同的平房内，没有暖气和卫生设备。60 年代初北京市负责同志看到我们住房条件差，安排我们搬到红霞公寓去住，承佩没有同意。1963 年政协秘书长张执一同志再次提出，让我们全家搬到和平里全国政协的一幢条件很好的公寓楼内居住，承佩也谢绝了。他常说，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解放前强多了，不必再给组织添麻烦。直至他年事已高，哮喘病经常发作，才搬到条件较好的复外大街楼房中来。

承佩对自己要求严格，但对过去做出过贡献的同志及其遗属却不忘怀。1979 年，朱葆光不幸去世，朱家生活困难，朱夫人扬琦请承佩为两个孩子安排工作，承佩没有推辞，鼎力相助。

在十年浩劫中，承佩被夺权、抄家、扣发工资、参加劳动，受到错误的审查、批判。我们的三个孩子当时都不在北京，有的在农村插队，有的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的在外地基层当工人，我们的生活相当困难。文化革命初期我担任光明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也受到错误的审查、批判，处境艰难，但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1983 年，我们年仅 37 岁的长子耿联（1970 年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因病去世。老年丧子，这件事对我们

两人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承佩忍着悲痛坚持工作，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毅力和品格。

承佩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于九三学社和统一战线工作。承佩突然病逝后，新华社于当天播发了他去世的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等立即刊登，中央电视台于翌日也报道了此事。承佩遗体告别仪式举行后，新华社于当日再次播发消息，中央电视台在晚七时新闻联播时间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配照片显著刊登消息内容（光明日报登在头版中间位置）。除此，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丁关根亲自来家中看望我。严济慈、孙晓村、平杰三、孔原、荣高棠、张光年等同志打电话慰问。全国政协和九三学社中央的领导同志等也来家中看望我。所有这些都使我非常感动，也表达了组织上对承佩的高度评价和深深的追悼之情。

转眼间承佩已辞世 25 年有余。25 年来我无时不在思念着他，思念着他的品格他的为人和他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的坚贞精神。其品格和精神不仅是对我本人永久的激励和鞭策，而且是我们全家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作者为孙承佩同志的夫人）

回忆王文元领导的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工作

张化本

1998 至 2002 年，王公文元先生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亲自抓参政议政工作，社中央的参政议政工作呈现出一种新局面。那时我先后担任社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在王公领导下从事参政议政工作，颇有一些感受。

（一）

抓好选题，是参政议政工作的关键。王公领导期间，社中央参政议政的选题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拓展。此前社中央的参政议政选题多是在科技、教育、农业、扶贫等领域。王公曾担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他发挥自身优势，将参政议政选题扩展到经济领域。他先后提出并主持了“国有企业改革”，“长江沿岸城市经济发展”，“发展内河航运”，“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等一批经济方面的调研课题。2000 年 7 月，王公主持召开了“21 世纪中国内河航运发展高级研讨会”，提出了“振兴内河航运，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建议。2000 年 10 月，九三学社中央在湖南岳阳举行了“长江沿岸城市经济发展研讨会”，王公以“十五规划”制定为背景，以长江流域所具有的区位、资源、经济等优势为依据，提出了“建设面向 21 世纪的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设想和实施建议。建议中特别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建设要重视环境保护”。这两次研讨会的成果形成了社中央在政协九届四次大会的发言和提案，产生了积极影响。如今长江经济带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 2014 年出台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初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又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回头来看，使我更深切体会到王公所提出和主持的这两个参政议政课题具有的战略眼光和深远意义。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遴选参政议政选题的重要指导原则。王公在以这个原则确定参政议政选题时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中共十五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和任务。王公围绕这个中心确定参政议政选题时采取了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思路。就前者而言，他通过“国有企业改革”这一课题就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提出改革建议；通过“深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这一课题就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提出建议；通过“培育与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这一课题，就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足与发展提出了意见建议。这样就从构成社会经济活动三要素的企业、政府和社会三方面

系统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议。就后者来说，他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融入了其它专题调研，提出对策建议。例如，在“防范和减少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课题中，他提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课题调研中，他提出“西部大开发要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路”；在“加强环境保护”课题中，他提出“推动环境保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等等。这样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中心任务在各相关领域推展开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选题思路使参政议政成果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例如社中央提出的“关于环保产业市场化的建议案”被评为九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

王公在参政议政选题中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选择那些尚未引起人们关注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切入，因而往往能言别人所未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水资源”是社中央长期关注的课题，王公曾代表社中央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作题为“树立水资源危机意识，合理开发，反对浪费”的大会口头发言，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是在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思路上，当时考虑的不外是“节水”、“防治水污染”、“控制地下水开采”、“调水”等人所共知的办法。能不能有新思路？王公提出了“海水淡化”。我记得他曾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他的思路：“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是一体的，虽循环往复变化但总是相对恒定的。因此蓄水、调水、开采地下水等方式，只是实现了水资源的时空位移，并没有增加其总量。而海水淡化是向取之不尽的海洋要淡水，实际上等于把水资源的蛋糕做大。这对于长远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具有战略意义。”他的这番话使我豁然开朗。在他的主持下，社中央就海水淡化课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提案。这件提案对有关部门制定海水利用专项规划产省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二）

调查研究是参政议政一项重要工作。王公对参政议政调研非常重视，五年中领导主持的调研活动达 17 个，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政协大会发言和提案。为了克服调研经费、地方接待等方面的困难，王公常吸收社中央相关人员随他参加全国政协及有关社会组织开展的调研活动，由此形成社中央的参政议政成果，我将其称为“借势”。我曾四次参加由他率领的全国政协调研考察活动，就“西部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闽台经贸合作与交流”等课题进行调研。在参加他率领的全国政协“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考察调研活动后，我根据王公的指示写出了题为“大力发展和规范民办高等教育”的参政议政文稿，作为社中央名义的发言和提案提交全国政协，被选为大会口头发言，由当时的社中央常委、社陕西省委主委姜信真代表发言。我还随王公参加了由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组织的“城市政府职能转变研讨会”和有关方面组织的“环境保护市场化暨环保设施运营企业管理高级研讨会”，并根据王公的讲话精神形成了“深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认清国情，加强环保”等一批政协发言和提案。

王公在调研活动中深入细致、认真负责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到下面调研，省市相关单位都会准备系统、完善的汇报材料，安排相关的参观点介绍情况。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听汇报，虽也能完成任务，但很难发现表象下的问题。为此，王公每到一处总是与介绍情况的人深入交流讨论，因而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1999 年 10 月我随王公参加了中央统战部和国土资源部组织的“保护，合理利用国土资源”调研活动。在秦皇岛市考察一个解决“城中村”，实行“平改楼”的项目中，在听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眉飞色舞的介绍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大家对这个项目评价都很高。王公却向介绍情况的干部和开发商仔细询问土地转化的每一个环节。开发商支支吾吾，躲躲闪闪，但最后不得不承认土地转化的方式是“协议转让”。王公当即指出：解决“城中村”，实行“平改楼”过程中，原来不值钱的土地增值了，级差地租显化。级差地租应由原土地上的居民，居民所在集体和国家三方面分享。这才符合马克思级差地租原理。而这个项目中的级差地租国家应得的并没有收归财政，而是落入了开发商之手，这是不合理的。后来王公在河北省，国土资源部举行的调研座谈会上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并严肃指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没有通过公开招投标等市场方式形成，而是凭关系一对一协商，“暗箱操作”，弊端太多，搞不好是产生腐败的又一黑洞。为此他建议，在

国有土地出让上实行招投标、拍卖等方式，让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减少土地出让中的种种弊端。后来土地转让方式的发展变化表明，王公当时的看法与建议是多么的准确与正确。

（三）

王公不仅抓参政议政的选题和调研，在参政议政的机制、队伍建设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社“六大”以后，社中央为加强参政议政工作，成立了“科技经济”、“教育卫生”、“农林”、“法制”等专门委员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作为社中央在参政议政方面的职能部门和各专委会的办事机构。专门委员会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领导薄弱、队伍松散、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还不能适应社中央日益繁重的参政议政任务。

王公担任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后，加强了专门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承担参政议政任务的专门委员会由原来的 4 个增加至 6 个，并且大部分专委会主任由副主席兼任，如王选副主席兼科技委员会主任，洪绂曾副主席兼农林委员会主任，赵伟之副主席兼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金开诚副主席兼教育文化委员会主任，加强了对专委会的领导。在十届二次中常委会议上，通过了《九三学社中央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为专委会工作在组织制度上提供了保证。王公注意学习借鉴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工作的经验，经常把这方面的材料批转给我。他在一次对专委会工作的批示中写道：“今年我社的专委会工作，要进一步加强与政协的联系。除了选题上的衔接外，还要重视学习他们开展工作的经验，如召开专委会主任联席会，沟通情况，定期总结，向常委会报告工作等，均值得借鉴。”按照王公的指示精神，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了专委会之间的联系与协调，使社中央的参政议政工作形成了合力。例如在 2002 年 9 月社中央举办了参政议政培训研讨班，请社中央各专委会负责人与各省级组织参政议政部门负责人交流。专委会同志介绍了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观情况，提出了本专委会参政议政的选题思路；地方组织的同志汇报了拟报送社中央的提案选题情况，专委会同志进行了分析点评。通过这种上下互动，左右协调，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社中央参政议政选题。

为了适应日益繁重的、高标准的参政议政任务要求，加强社中央对参政议政工作的领导，王公感到需要建立一支社中央直接领导的，由社内外相关人士组成的综合性的参政议政研究队伍。在他的倡导下，2000 年 3 月 15 日社中央成立了参政议政工作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的组成人员以专委会的骨干为主，也有专委会以外的专家；以社内人员为主，也聘请了一部分社外专业人士。王公在成立大会上向各位研究员颁发了聘书。参政议政研究中心的成立提高了社中央参政议政的综合决策和快速反应能力，使社中央领导在参政议政方面有了一个直接的抓手。王公经常召集中心的研究员们研究参政议政问题，特别是一些宏观的，综合性问题。例如“西部大开发”课题，王公不仅召集研究中心人员开会研究，还吸收一些研究员参加了中央统战部组织的“西部大开发”赴云南贵州调研活动和社中央在西安召开的全社西部大开发研讨会。研究中心的参与拓展了“西部大开发”课题的广度和深度，为社中央领导参加高层协商会和政协常委会的参政议政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例如，有研究员提出的“借鉴国外开发欠发达地区经验，促进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顺利实施”的建议，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西部大开发建言献策，被选为社中央名义的政协常委会发言，受到关注和好评。

王公重视参政议政成果的总结和文献整理工作。他提出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后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的成果编辑成书，以展示九三学社作为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并责成我具体负责此项工作。我和专委办的几个同志历时数月，搜集整理了自 1989 年至 2001 年社中央领导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考察调研报告和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研讨会上的发言；在全国政协大会、常委会上以九三学社中央和九三界别名义提出的发言和提案；社中央组织的重要参政议政专题调研论文，共 78.9 万字。王公对此书十分重视，对全书的内容和体例提出了要求，并亲自审阅了全书的文稿，认真修改了我为他起草的序。此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吴阶平主席为此书题写了书名《九三学社中央国是建言集萃》。此书检阅了九三学社中央在中共中央【1989】14 号文件发表后 12 年中的参政议政成果，受到社内外的好评。

在王公的领导下，九三学社中央的参政议政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开阔的思想视野、缜密的思维方式、睿智的选题技巧、务实的工作作风，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作用，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益良多。因此，此文不仅是对王公领导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工作那段历史的回顾，也寄托了我对王公文元先生深切的缅怀之情和纪念之意。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参政议政部原部长）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写在茅以升诞辰120周年之际

咎建军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是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里的名句。

1956年毛泽东巡视南方，视察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施工，并畅游长江写下该词。这首词描绘了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突飞猛进的新局面，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建设祖国和改变山河的豪迈气概，对未来景象的展望，也表达了一桥飞架南北的历史意义。

茅以升就是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者。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建造了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 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武汉长江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上层为公路桥，宽22.5米；下层为铁路桥，宽18米。正桥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其更大意义是把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联成一体，具有跨时代性。

1958年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最后签了名。

茅以升造桥的英名是从设计制造钱塘江大桥开始的。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经过5年的努力，茅以升终于靠中国人民的智慧建成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茅以升的名字也传遍大江南北，乃至影响我国桥梁界、工程界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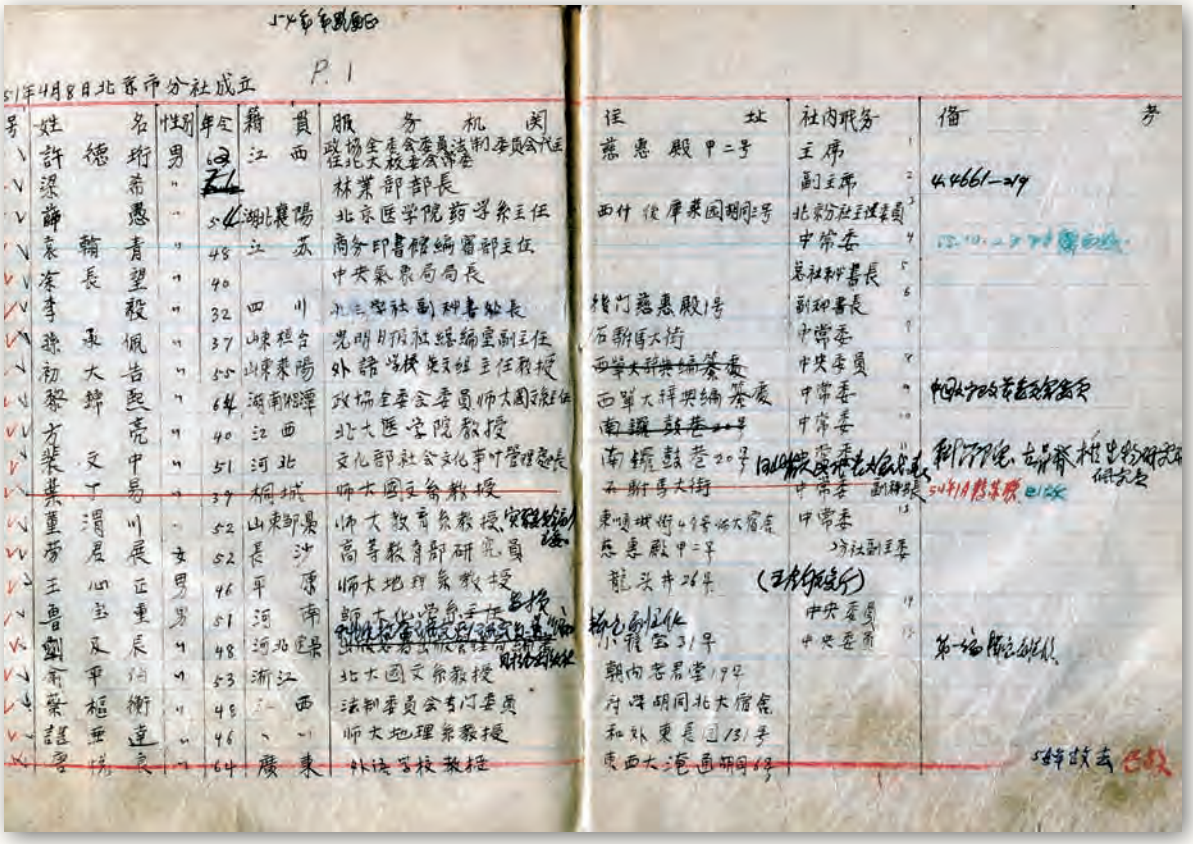
2016年1月9日是茅以升诞辰120周年纪念日（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他离开我们也27年了。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奋斗，我国已经跨入世界造桥强国，神州大地各种结构的新型桥梁贯通千山万水。

在此时刻，我们更加怀念我国现代桥梁建设的开拓者茅以升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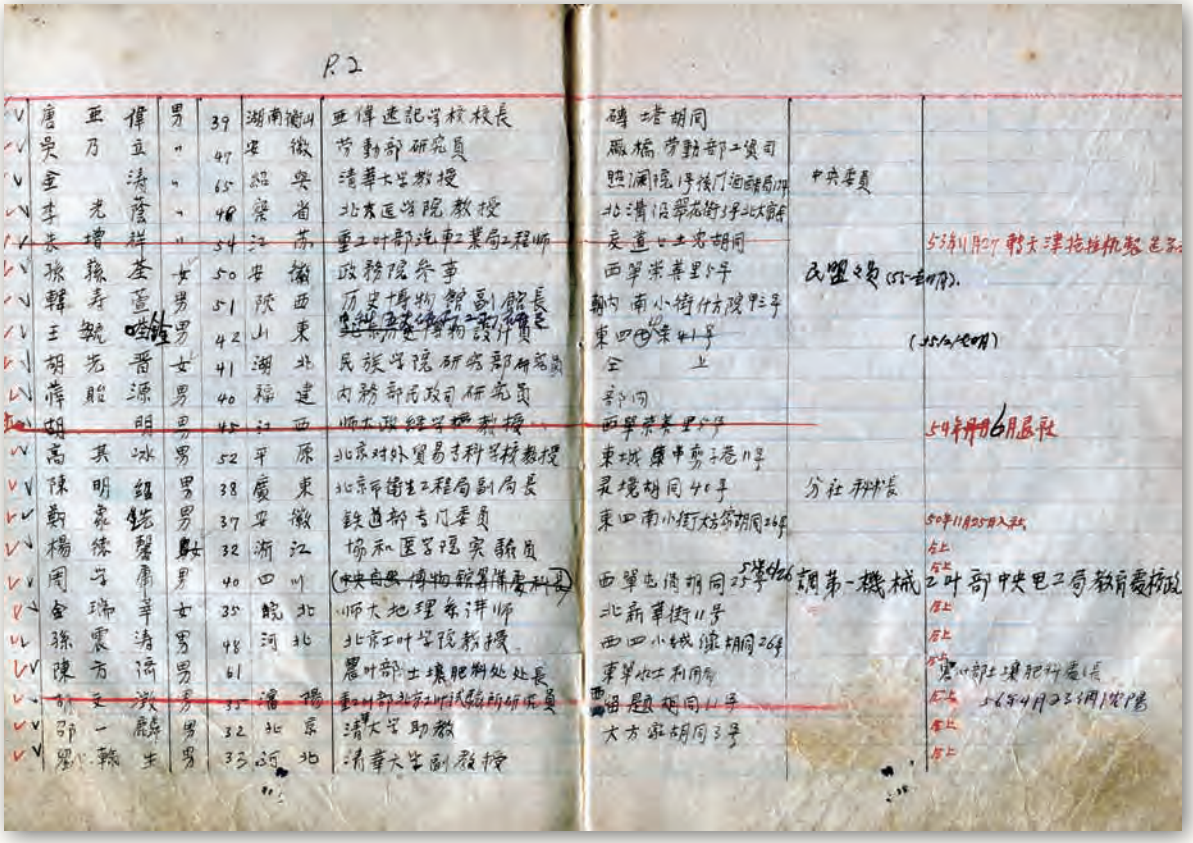
茅以升的造桥才华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要从他小时候的志向说起。

茅以升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而他因为肚子疼没有去。那天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不管它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本……，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茅以升桥话》的初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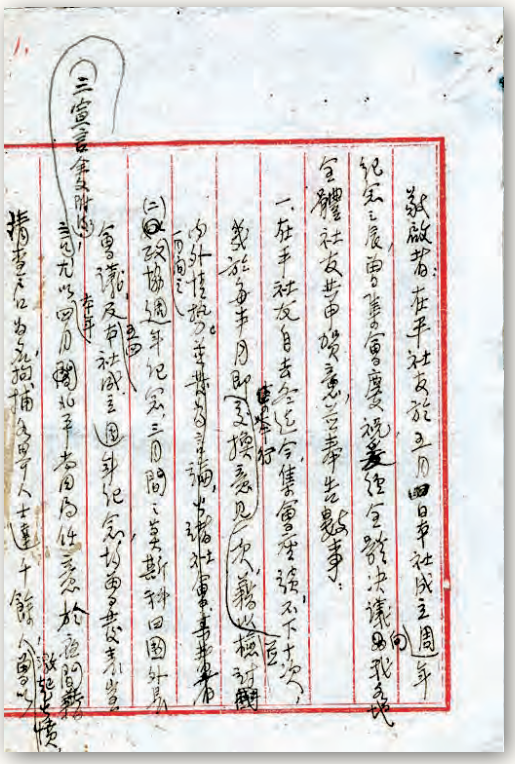
茅以升中学毕业后，先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毕业后，由唐山路矿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9月起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茅以升于1917年获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业硕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桥梁桁架之次应力》，这篇论文，在当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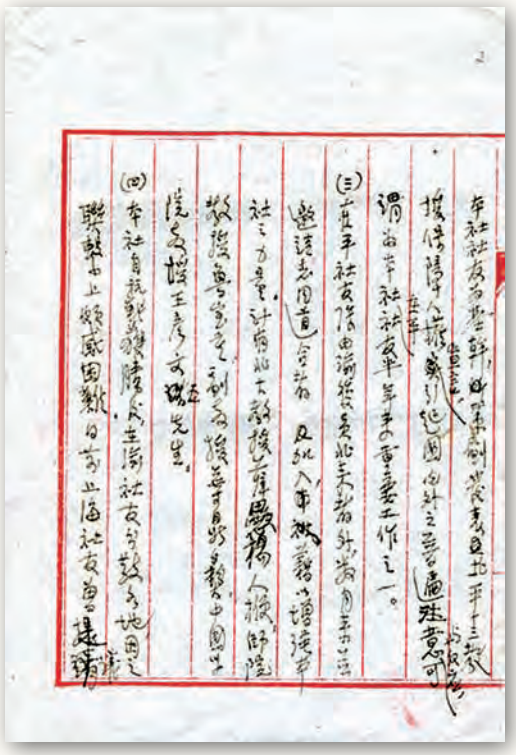
北京分社早期社员名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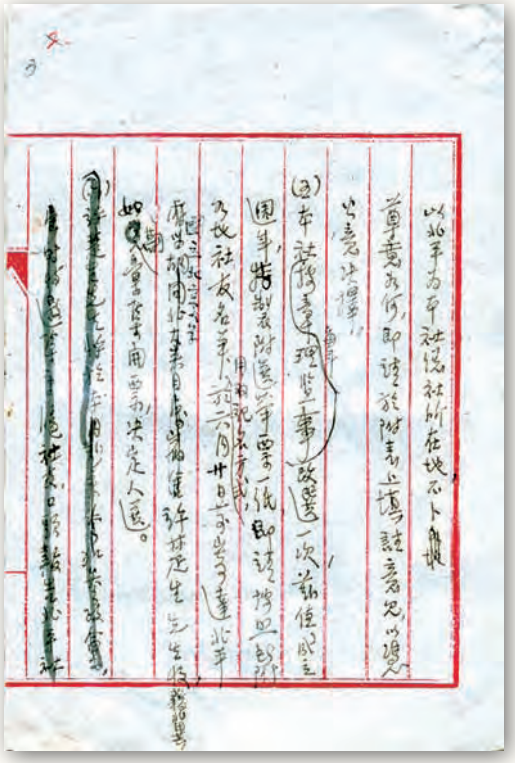
北京分社早期社员名录（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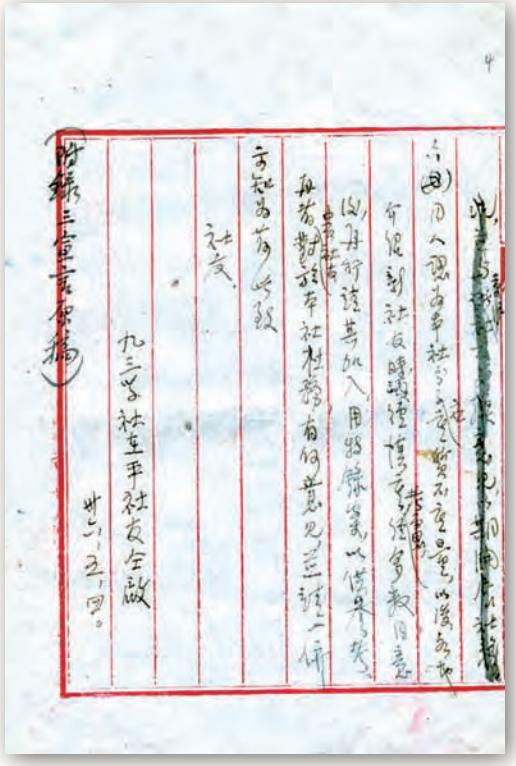
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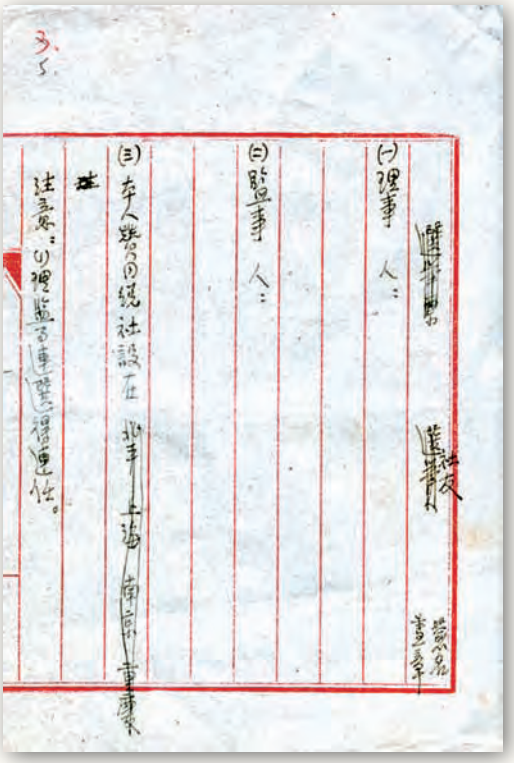
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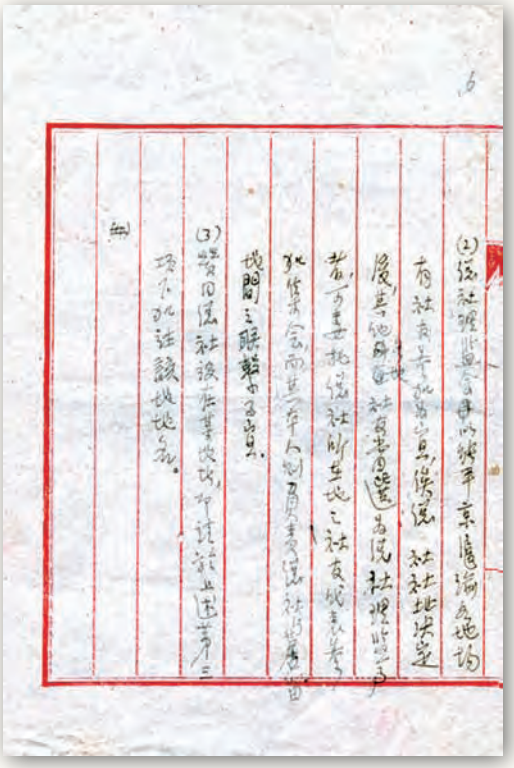
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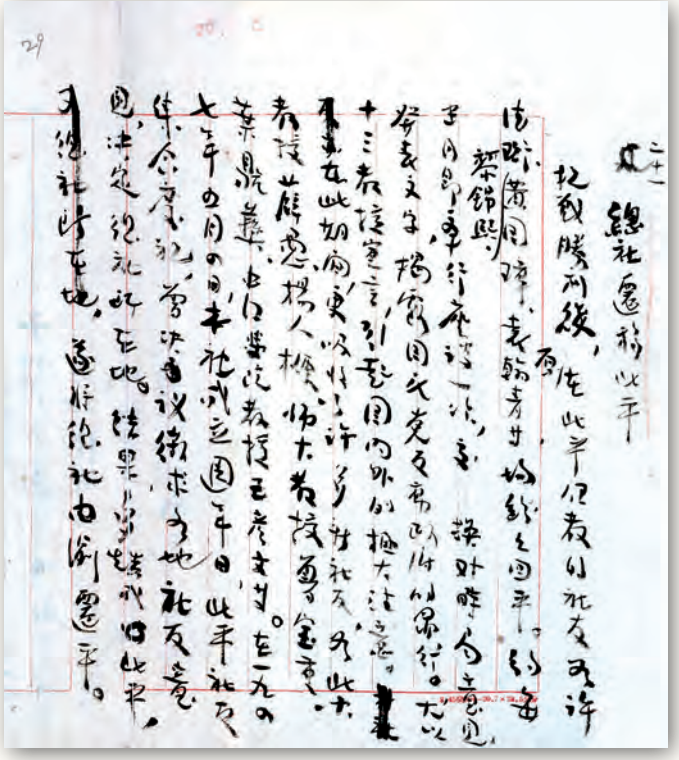
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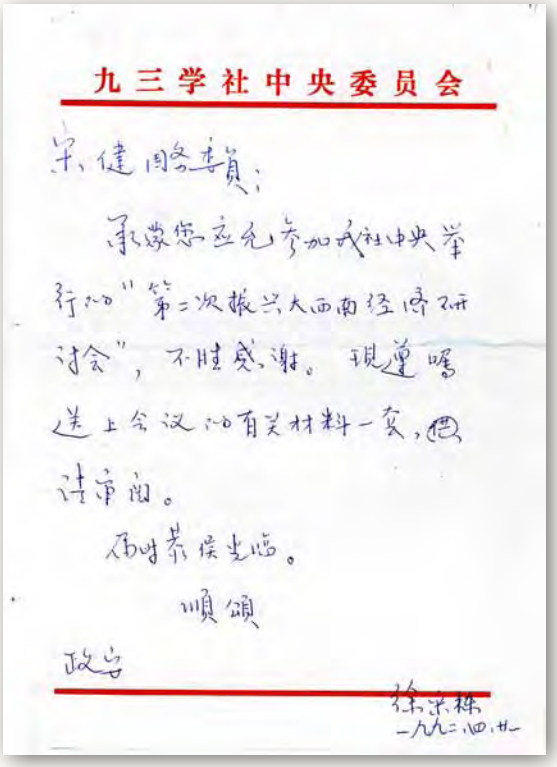
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五）



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六）



笪移今关于总社迁移北平的回忆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宋健略教：

承蒙您应允参加我社中央举行的"第二次振兴大西南经济研讨会"，不胜感谢。现遵嘱送上会议的有关材料一套，供请审阅。

届时恭候光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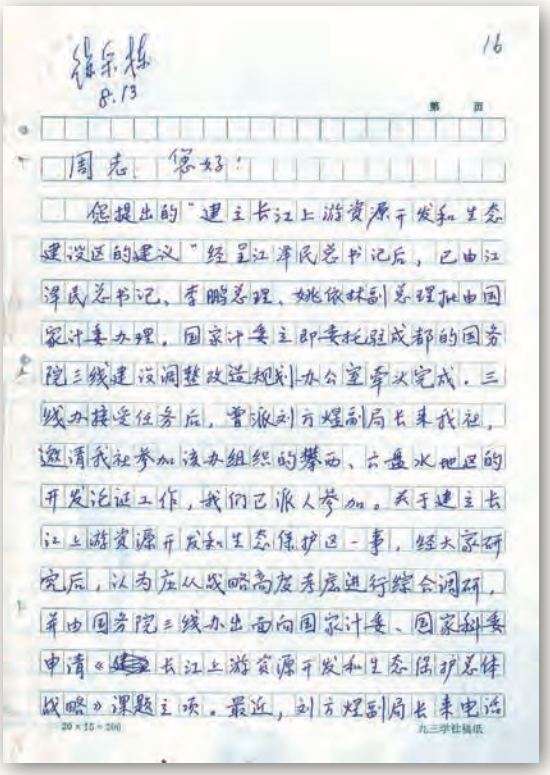
顺颂

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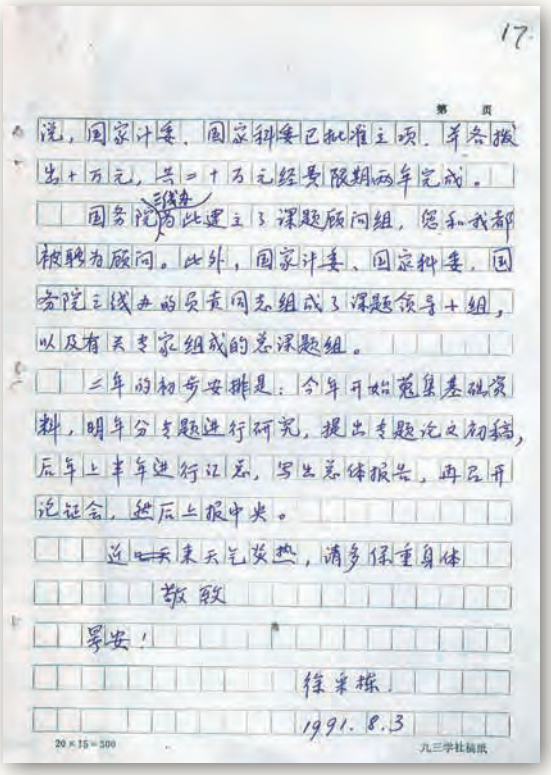
徐采栋

一九九二、四、廿一

徐采栋致宋健的便笺



徐采栋关于建立长江上游资源开发和生态建设区立项的问题给周培源的信（一）



徐采栋关于建立长江上游资源开发和生态建设区立项的问题给周培源的信（二）



徐采栋（左二）参加九三学社建社48周年座谈会

具有世界水平，因而荣获康奈尔大学颁发的金质研究奖章。1920 年，茅以升毅然回国。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北方中国交通大学校长等职。茅以升认为，中国的大川大河上，已有一些大桥了，但都是外国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蚌埠淮河大桥是美国人修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罗斯人修的，云南河口人字桥是法国人修的，沈阳浑河大桥是日本人修的……。我们中国人要修自己设计制造的桥！就是靠这股信念和学识，茅以升对钱塘江大桥开始了总体设计。

1934 年至 1937 年，茅以升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挂此职到 1949 年），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一座全长 1453 米，基础深达 47.8 米的双层公路铁路两用钱塘江大桥。大桥于 1937 年 9 月 26 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1937 年 12 月 23 日，为了阻止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亲自参与了炸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 年 3 月，大桥修复通车。建桥纪念碑的碑文记录了这段悲壮的史实：

“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在敌机轰炸下昼夜赶工，铁路公路相继通车。支援淞沪抗战、抢运撤退物资车辆无数，候渡过江，数以数十万计。当施工后期，知战局不利，因在最难修复之桥墩上预留空孔，连同五孔钢梁埋放炸药，直至杭州不守，敌骑将临，始断然引爆，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当时先生留下“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之誓言，自携图纸资料，辗转后方。”

在国家受到外敌入侵之时，为了阻断敌人，茅以升受命炸断了亲手建造的大桥，这悲壮的义举，也是钱塘江大桥永载史册的特殊意义。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实践誓言，又主持修复了钱塘江大桥。建桥、炸桥、复桥，茅以升先生始终其事，举世鲜有。 茅以升、钱塘江大桥和那段中国历史从此凝聚成一种坚强的中华民族精神！茅以升先生的爱国志向、科研才华和他设计的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可谓当惊世界殊！

钱塘江大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展示了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我国桥梁工程界的先驱在钱塘江大桥建设中所显示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为人先的科技创新精神，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茅以升是九三学社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坚持爱国主义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是九三学社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坚持弘扬民主科学精神，是九三学社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1946 年 5 月 4 日，九三座谈会改建为九三学社。“九三”之命名，既是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庆祝和纪念，同时也寄托了九三学社的先贤们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期冀和企盼，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和渴望，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茅以升先生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正是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精神的代表。从成立到现在，九三学社有一批像茅以升先生这样的科学家，如梁希、严济慈、金善宝、周培源、邓稼先、王淦昌、赵九章、谢家荣、黄汲清、涂长望、王选、黄昆、师昌绪、谢家麟、程开甲，他们不仅在各自的科研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他们也共有一种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勇气和自信，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以“四个全面”战略目标，带领全国人民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中华民族正在崛起！国家面貌蒸蒸日上！但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还不平衡，在世界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发展还相当薄弱，教育事业还有待从灌输知识的模式向培养更多探索型创新型人才目标努力。我们更要向茅以升先生学习，弘扬他的精神，以坚定的爱国主义，顽强的探索勇气，踏实的敬业工作，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为民族的科技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研究室社史研究处处长）

《九三学社简史》（2015年版）修订说明

社中央研究室

为庆祝九三学社创建70周年，九三学社中央决定对2005年版《九三学社简史》（以下简称《简史》）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工作由社中央研究室承担。

在修订《简史》时，我们努力遵循以下基本指导原则：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坚持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

（二）在保持2005年版《简史》框架结构和内容基础上修订，而非重写，并续写2002年底至2014年底的内容。

（三）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充分吸收近年来社史研究的成果，对有确切史料证明2005年版《简史》中叙述有误的内容进行订正，对虽有争议但缺乏史料证据证实的内容一般不作大的改动。

2014年4月，《简史》修订工作正式启动。全书正文共十六章（原书共十六章，其中第一至七章修订合并为第一至五章，此后章节依次递进，新增第十五、十六章），段正初负责修订第一至五章，其中，郭祥提供了第四章第四节的修订初稿；咎建军负责修订第六至八章；夏德美负责修订第九至十四章；乔发进负责增写第十五至十六章。大事记修订也由上述人员分工负责。《简史》修订内容经集体讨论后，由研究室主任郭悦统稿。

《简史》修订初稿在征求社中央领导、社中央机关各部门、各省级组织及社内外社史专家意见基础上，进行了多次修改，于2015年7月底正式定稿，即将正式出版。

根据前述原则，此次修订在基本保持2005年版《简史》原貌的前提下，除了一些文字调整外，在内容上有不少新的表述和增补，主要包括：

1. 关于“民主科学座谈会”

近10多年来，社内外有不少质疑九三学社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真实存在的声音。根据现有研究，我们认为，“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存在是客观史实，但这个座谈会也确实没有向社会公开。因此，我们增引了一大段潘菽关于“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回忆，以佐证历史真相；同时在使用“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名称时，均加上引号，以示其为后来社史之指称。

此外，依据历史资料、现有研究成果及其对九三学社发展所起作用，在深化论述许德珩、褚辅成、张西曼、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张雪岩、吴藻溪、金善宝、孟宪章、王卓然、劳君展、黎锦熙等重要创始人历史功绩的同时，还在相应位置增加了笪移今、彭饬三、卢于道、王造时、初大告、汤璪真等重要创始人的内容，丰富了九三学社创始人群体的历史叙述。

2. 关于上世纪40年代后期“总社”问题

2005年版《简史》在叙述总社时说：“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总社在指导重庆分社成立以后，迁往北平。”在社史修订过程中，我们重新整理、收集了一批与总社相关的社史资料，包括：（一）1947年3月，许德珩写给笪移今的信，向上海九三同仁征询总社应设于何地；（二）1947年5月4日，北平社员向全社征求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函；（三）建国初笪移今关于总社迁平的回忆，其中谈及：意见函发出后，根据全社大多数人的意见，将总社正式迁移至北平。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认为，2005年版《简史》关于九三学社总社在1946年10月迁往北平的叙述是不正确的。真实的情况是，1947年6月左右，在征得各地社员的赞同后，北平被确立为总社所在地。

3. 关于 1956 年组织大发展

九三学社 1946 年正式成立时，创始人仅有几十人，至 1950 年，社员人数仅为 117 人。在许德珩的直接推动下，1956 年九三学社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大发展”的热潮，使是年成为改革开放之前九三学社组织发展最快、社员人数激增且对于社组织发展工作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年，“反右”期间许德珩受到批判亦与此直接相关。因此，在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第七章增补“加强组织发展”一节。

4. 关于“反右”及“文革”期间的九三学社

2005 年版《简史》对于“反右”及“文革”时期的历史采取了回避态度，内容过于简单。这次修订在挖掘史料基础上，补充了一些史实，扩充了相关章节。

一是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单列成节，补充叙述了“反右”期间九三学社的活动以及在“反右”时期被打成右派的社员人数和著名人物等。

二是丰富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严峻考验”一节的内容，具体叙述了九三学社在“文革”时期被迫停止活动以及遭受的重大损失，适当增补社员在逆境中为国奉献的事迹。

5. 删除关于会议、领导人活动等不必要的记述，增加“新时期的建言献策”内容

2005 年版《简史》第八至十章（即从建国到“反右”）以及第十一至十六章（从“文革”结束到九三学社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以及常委会都作了详尽记述，大量引述会议报告、领导讲话等内容；同时存在对领导人活动事无巨细、不加区分记述的问题。在此次修订中，我们对相关内容在归纳、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上作了较大幅度的删减，同时也删除了一些意义不大的关于领导人活动的记述。

“文革”结束后，九三学社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1977 年至 2002 年，九三学社在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和自身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部分，我们在完善现有内容时，强化了对九三学社能够载入史册的提案与建议的介绍，如“863”计划、关于三峡工程的建议等。

6. 新增 2002 年底至 2014 年底的内容

2005 年版《简史》只写到 2002 年底换届和胡锦涛同志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本次修订则记述至 2014 年底，并对九三学社创建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这一时期，九三学社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付出极大努力，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内容非常丰富，成绩非常显著。新增部分的记述，力图简练而全面地展现这一时期九三学社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社会服务、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机关建设等工作上取得的成果。

新增的这部分内容，是本次修订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我们在撰写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这段历史。

一是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九三学社生命线的高度来把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九三学社顺应历史和时代要求作出的自觉选择，也是九三学社保持蓬勃发展活力，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必由之路。这部分着重记述 12 年来九三学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具体举措。例如，开展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主题的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活动，实施人才强社战略等。

二是从围绕发展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主要任务的高度来把握。这一时期，九三学社围绕非典防治、加大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力度、解决国有企业退休科技人员待遇、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改进我国医疗卫生工作、低碳发展、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等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着重把这些建言献策的背景、经过和具体影响呈现出来，予以充分反映。

三是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的高度来把握。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先后颁发 2005 年 5 号文件、2006 年 5 号文件、2012 年 4 号文件，召开了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以及第 20 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我们着重记述九三学社贯彻落实这些文件和会议精神、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些具体做法和经验。例如，九三学社在整合力量、完善机制方面所做的工作，内部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等。

由于时间紧迫，修订者水平有限，书中必然存在着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以便在下次社史修订中加以完善。

九三学社总社迁北平考

乔发进

1946年5月5日，即九三学社成立大会的次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大批因抗战而被迫迁徙的民众先后踏上回家之路。九三学社成立大会选出的24位理监事，除2人留渝外，先后回迁南京、上海、北平、苏州等地。随着理监事及社员的陆续离开，九三学社自然也面临着一个迁移和发展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九三学社简史（2005年版）》（以下简称《简史》）是这样叙述的："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总社在指导重庆分社成立以后，迁往北平"。[1]同一时期的其它有关九三学社历史的书籍，基本和《简史》的论述一致。2014年，郭祥同志撰写了《九三学社总社迁上海考》一文（以下简称郭文），对《简史》中的"总社北迁说"提出了质疑，并提出"总社初迁上海说"，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九三学社总社最初迁移上海，直到1950年3月，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恢复成立，九三学社中央（总社）才正式确立设在北京。"[2]2015年，由王世铎同志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九三学社史话》，亦对1946年"总社北迁说"提出异议。毫无疑问，郭文的"总社初迁上海说"是对原"总社北迁说"的巨大颠覆。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正确？史实究竟又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是九三学社早期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很有必有考证清楚。本着求真务实和百家争鸣的精神，现就九三学社总社自重庆迁至北平问题作一考察论证，以就教于方家。

一

要厘清九三学社总社迁移问题，必须首先对"总社北迁说"和"总社初迁上海说"的由来作一探究。

"总社北迁说"，最早见于1950年1月上海《大公报》出版的《1950人民手册》。《手册》记载："该社总社原设重庆，后迁北京"。[3]不过，《手册》并没有提及总社北迁的时间。

1952年6月29日，九三学社中央印制的《九三学社简述》首次提出总社北迁的时间。《简述》说，"1946年8月，总社迁到北京。"[4]然而，同一时期的上海《大公报》在其出版的《1952人民手册》中，对九三学社北迁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总社原设重庆，1946年10月迁北京"。[5]

1957年3月15日，由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和学习委员会编写的《九三学社概要》，沿用了《简述》的表述：1946年8月，社中央迁到北京。

1998年，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所著的《九三学社简史》重新表述为："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总社在指导重庆分社成立以后，迁往北平"[6]。此后，九三学社中央关于总社北迁的时间，都沿用了这一说法。"总社北迁说"由此基本定型。

郭文主张的"总社初迁上海说"，其重要依据之一是1948年出版的《中国党派》一书。《中国党派》记载："该社在重庆成立，国府迁都后，政治中心东移，始迁往上海"。[7]其实，在《中国党派》一书出版之前，就已经有类似记载。1947年11月，由江西尖兵半月刊社发行出版的《最近中国各党派》用一个章节对九三学社

1.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著：《九三学社简史（2005年修订版）》，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2. 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4年第1期，第21页。
3. 张篷舟，张仪郑编：《1950人民手册》，上海大公报1950年出版，第244页。
4.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存。
5. 张篷舟，张仪郑编：《1952人民手册》，上海大公报1952年出版，第244页。
6.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著：《九三学社简史》，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7.《中国党派》，中联出版社1948版，第272页。

进行了介绍。文中说，“三十四年抗倭胜利后，国内民主之风浪，颇极高潮，于是褚辅成、许德珩、王卓然等情不自禁，乃以学社相号召，为纪念抗战胜利，用‘九三’命名，组织该社于重庆，该社虽以‘学’字为号召，顾名思义，应为纪念胜利之学术团体，无如该社首脑人物如褚辅成等，竟别开生面，标榜政治活动，并尽量吸收一般左倾文化人，形成一个政治团体，该社系成立于重庆，国府迁都后，复迁于上海，仍于重庆设立于分社”。此书还强调，“该社总社现设上海，并将于各地设立分社，现以重庆分社最为活跃”。[1] 从时间上看，除九三学社自己发表的宣言及有关新闻报道外，《最近中国各党派》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对九三学社进行介绍和评说的公开出版物。

1983 年，台湾学者王觉源在其所著的《中国党派史》中亦写到：“该社成立于四川重庆。国府迁都南京后，始迁往上海。仍于重庆设立分社，从事川省的活动”。[2]

比较这三本书中关于九三学社部分的记载及评说，大部雷同。例如，都强调九三学社虽以学社为号召，实乃一政治性的结社；对褚辅成、许德珩、王卓然、张西曼等人都有一简要介绍，认为他们系不满政府者；都详细记载了褚辅成在上海法学院主持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及通过的四项决议。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党派》《中国党派史》中关于九三学社的史料，很可能都源自《最近中国各党派》。

二

然而，根据已有和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总社北迁说”和“总社初迁上海说”其实都是错误的。

先来看一封信，其全文如下：

移今吾兄：

弟又生病，现幸略好。为四外长会议问题，此间曾讨论两次，昨日获有结果。成中西文意见书各一份，今特寄上，请转沪上社友讨论。为时间便利，西文稿已交此间外国友人发出，中文稿交《大公》、《文汇》通讯人员，惟不知能发表得出来否？兄收到后若仍未见报，可否由沪友讨论即发表（从速）？此间昨日大家有两意见：（一）九三总社究应设在何处？因此一问题不确定，进行上殊多障碍，即如几次平方朋友所拟之稿，未能征询沪友之意见即作为九三意见而发表（此次亦然），若不是朋友相知甚深，很可能生出意见！对于总社的地方问题，拟请沪上朋友讨论。（二）社务发展。社员较多，各地社员名单、履历，亟应制定，相互报告。（三）南京方面人数不少，不知进行如何？昨日海平有函致潘水书兄，上海同人亦可督促。余不尽，即询

近安

弟楚

十八日[3]

此信（以下称“信十六”）是许德珩 1946 年春至 1948 年夏写给笪移今的 22 封书信中的一封，原件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系笪移今捐赠。笪移今在其回忆文章《九三学社的缘起和在上海的斗争》中曾论及这些信件，“那时我年轻，在褚老的委托和理事会的领导下负责推进社务，同时不断接到许老给我有关开展工作的指示（现存有 1946 年春至 1948 年夏许老给我的 22 件手书，及马叙伦、谭平山、陶行知等写给我的亲笔信）。”[4] 因此，这 22 封信件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它们为我们了解九三学社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原“信十六”只写了日子“十八日”，没有写明年和月。但“信十六”中所提的“四外长会议”，是指 1947 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24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届四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外长建议将解决中国内战问题列入会议议程。由于美国持强烈反对态度，会议最终未将中国内战问题列入议程。因为这次四国外长会议涉及到中国，引起了九三学社在北平同志的注意，经过讨论形成了针对四国外长会议的意见书。在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中，我们发现了这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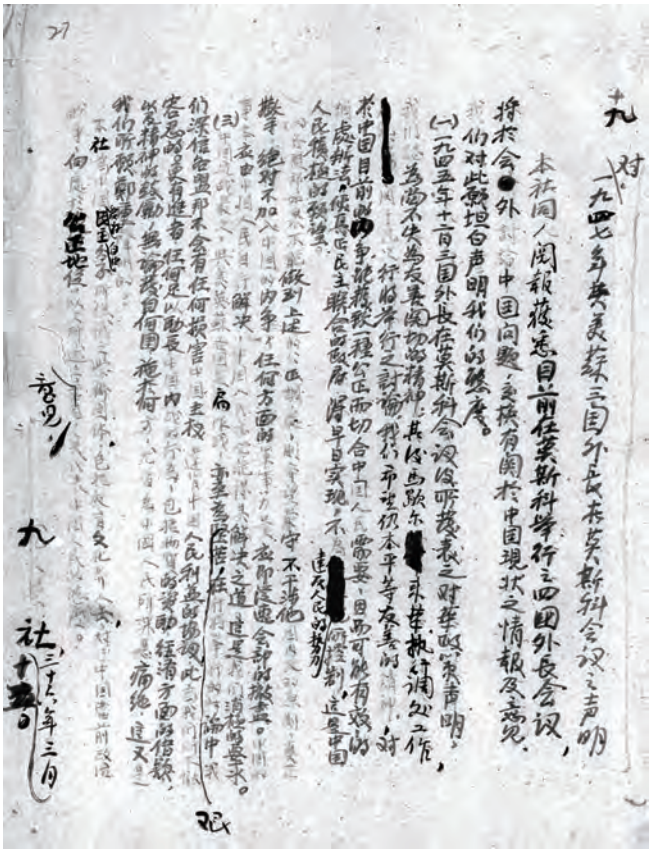
1. 谢纲槐编著：《最近中国之党派》，金星印刷厂 1947 年版，第 121 页。

2. 王觉源著：《中国党派史》，正中书局 1983 年版，第 403 页。

3. 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5 年第 1 期，第 15 页。

4.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编：《上海九三学社专辑》，第 3 页。

意见书的原稿，其形成日期是1947年3月15日。同时，“信十六”中有“为时间便利”，“从速”等字眼，这说明“信十六”的写作时间与意见书的形成日期间隔不会太长，它要么写于1947年3月18日，要么写于1947年4月18日。根据许德珩致笪移今的22通信可知，若有要事相商，二人写信与回信的频率一般为2至8日。许德珩在1947年3月31日致笪移今的信中说，“二十四日手书得悉”。因此，“信十六”写于1947年3月18日，是比较符合二人的通信频率的。而许德珩于1947年4月28日写给笪移今的信中说，“多日未得兄函，为念。”这说明二人在4月的通信中断了一个时期。若“信十六”写于4月18就与此相矛盾。由此可以推断，“信十六”应写于1947年3月18日。



对1947年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之声明底稿

“信十六”确凿无误地表明，至少到1947年3月，九三学社总社设于何处的问题依然没有确定。在总社设立问题上，九三学社在北平与在上海的同志存有一定分歧。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九三学社社务工作的开展。因此，许德珩才会致信笪移今商讨此事。

综合来看，“信十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九三学社的社务工作。通信人是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记录的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因此其可靠程度要远远高于《最近中国各党派》的记载，同时也高于《1950人民手册》的记载。所以，“信十六”可视为九三学社至此时仍未明确总社设于何处的“铁证”。而下面我们还会看到，此信并非孤证。

三

在提出“总社初迁上海说”时，郭文除了《中国党派》对九三学社的记载外，还提出了三点依据。笔者认为，这三点皆不足为据。

首先，关于“兰园会议”。1946年5月12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兰园召开了理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了社务及时局问题。“兰园会议”既是九三学社早期召开的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也是最后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在九三学社早期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会议通过的决议提出：“设总社于京、沪区，设分社于重庆、武汉、成都、昆明、香港、广州、北平、天津及伦敦等地。”[1]然而，“设总社于京、沪区”只是“兰园会议”对于未来总社迁移的一种谋划和设想，这一谋划和设想是否落实了呢？无论是上海分社创始人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笪移今等人的有关史料或回忆文章，还是其他各位创始人的有关史料或回忆文章，均无总社设于上海或南京的任何记载。因此，“设总社于京、沪区”的谋划和设想是没有落实的。我们不能把“兰园会议”的一种谋划和设想当作已经发生的事实。郭文还提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成为全国政治副中心，众多党派和人民团体云集于此。”[2]但众多党派和人民团体云集上海，并不必然导致九三学社的总部也要设在上海。这其中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推

1.《九三学社通过决议要求停止各地内战 并要求取消党化教育，改善教职工生活》，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5月14日第2版。

2. 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4年第1期，第21页。

论显然难以成立。

其次，关于九三学社在上海的活动报道。郭文列举了以下 5 则报道：1.1946 年 6 月 26 日，九三学社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及致南京受难人士慰问电（重庆《新华日报》6 月 27 日）；2.1946 年 9 月 1 日，九三学社发表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纪念宣言（重庆《新华日报》9 月 3 日）；3.1946 年 10 月 24 日，九三学社发表对时局六点意见（重庆《新华日报》10 月 31 日）；4.1946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十一团体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上海《文汇报》1947 年 1 月 1 日）；5.1947 年 5 月 4 日，九三学社发表纪念“五四”宣言（上海《文汇报》1947 年 5 月 4 日）。郭文认为，“以上报道，第一、二则《新华日报》均以‘本市消息’报道，但没有言论发表具体人员、地点详细报道。第三、四、五则消息，发生地是在上海。”郭文便以此为总社设在上海依据之一。这个理由能否站住脚呢？我们再来看看许德珩写给笪移今另外几封信的摘录：

“本社对时局及马夷初先生等被殴均有表示，明日（二十七）（渝）各报均可刊出。今将宣言及电稿寄来，请分送上海各报，并请沪上同人之参考也。”（1946 年 6 月 26 日）

“此间留人不多，今日集会拟定数点，今寄来，拟请在沪同人斟酌，并请送沪上各报发表。”（1946 年 8 月 31 日）

“前日留此同人曾聚会，对时局发表意见。今日寄往此间各报发表，特将原稿一份寄来，望从速商之留沪诸友并商之褚慧老，送到上海可能的各报发表”（1946 年 10 月 25 日）

“在平同仁拟定宣言稿，多番斟酌，今寄来，请兄设法转印，分送同人斟酌，并望送《文汇》、《大公》及各报。”（1947 年 4 月 28 日）[1]

根据这几封信可知，实际上除了第四则消息外，第一、二、三、五则消息都是由九三学社北平的同志起草，然后才寄给上海的同志商议讨论，并请上海的同志送报发表。众所周知，在当时的国统区，国民党的党营报刊在宣传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九三学社对时局的主张、宣言或声明等，都是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希望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这些宣言或声明自然只能选择那些与自己主张相近或者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报刊发表，如《新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民主报》等，否则绝难发表。为了确保发声，扩大社会影响，九三学社的意见书往往会请各地同志通过私人关系分送多个报刊。笪移今就曾经回忆，“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正式成立之后的有些活动，都是通过《时代日报》的陆诒和《文汇报》的秦柳芳两位同志向社会报道的”。[2] 因此，有关九三学社的消息发在上海，是社内同志沟通联络、努力扩大社会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总社就设在上海。至于第四则消息，确实是社上海组织以九三学社的名义发表的声明。不过我们从许德珩致笪移今的信件中也可知，社北平组织同样也有直接以九三学社名义发表意见的情况。因此，单凭这一则消息，证明不了什么问题。

第三，关于九三学社理事、监事复员后的分布情况。复员上海的理监事有 6 人（褚辅成、吴藻溪、孟宪章、笪移今、卢于道、侯外庐），其中包括常务理事 2 人（褚辅成、吴藻溪），常务监事 1 人（卢于道）；复员北平的理监事有 4 人（许德珩、张雪岩、黄国璋、黎锦熙），其中包括常务理事 3 人（许德珩、张雪岩、黄国璋）。因此，单以多寡论，上海确实数量占优；但若以份量论，两地基本持平，北平甚至还略占上风。笔者认为，份量往往要比数量更为重要。甚至就连郭文本身也认为，“本条理由以人员多寡说明问题，略显牵强。”[3]

四

“总社北迁说”关于北迁的时间，最开始并未明确，后来又有 8 月和 10 月两种说法，直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才定型为“1946 年 10 月 27 日，九三学社总社在指导重庆分社成立以后，迁往北平”。前前后后多种表述，恰恰证明这一说法存在疑点。同时，总社既然迁往北平，那么又迁到北平的哪个地址？所有持“总社北迁说”的

1. 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5 年第 1 期，第 13—15 页。

2.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编：《上海九三学社专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2007 年出版，第 11 页。

3. 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4 年第 1 期，第 23 页。

史料对此均未置一词。“总社初迁上海说”的漏洞则更大，它甚至从未提及总社迁移的具体时间和地址。

仔细分析“总社北迁说”的时间，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其实是以许德珩离开重庆的时间为参照的。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召开成立大会。在出席这次会议后的第三天，即10月30日，许德珩携子女从重庆飞抵北平。[1]

这种参照有没有道理呢？一般而言，政党领袖因为代表政党组织发表纲领、意见、主张等，往往会成为政党组织的象征。特别是有些政党在初创时期，人数不多，没有设置专门的工作机构，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党领袖的住所通常就人们被视为政党组织所在地。因此，对于一个初创的政党来说，以政党领袖的行踪为参照，来判定这个政党组织的迁移情况，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政党领袖与政党组织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政党领袖住所地和政党组织所在地，也并不总是一致的。一个较为成熟的政党，通常都会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和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政党组织的迁移，就应以机构和部门为参照。

从九三学社早期历史的实际看，选出了常务理事会和常务监事会，但没有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和部门，同时也没有明确社的领袖。在所有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中，以迁往上海的褚辅成和迁往北平的许德珩两人社会声望最高，政治影响力最大。他俩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九三学社领袖人物的角色。

从与九三学社的关系看，褚辅成和许德珩是九三学社早期起着最为关键作用的两个人物。筹备期间，褚辅成和许德珩一同被推为九三学社主要筹组人；召开成立大会时，褚辅成和许德珩一同被推为主席团成员，褚辅成致开会词，许德珩报告筹备经过，两人一同被选为理事；召开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时，两人又一同被选为常务理事。作为九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重要领导人，他俩并肩战斗、密切合作，为九三学社的创建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从资历上看，褚辅成更胜一筹。在九三学社当时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献及有关新闻报道中，褚辅成的排名一般都在首位。《最近中国各党派》《中国党派》《中国党派史》这三本书在介绍九三学社的主要人物时，也都先介绍褚辅成，并称褚为“该社之首要人物”，“次则为许德珩、王卓然、张希曼等”[2]。

从具体社务工作看，许德珩则更为积极和活跃。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主要是许德珩发起组织的；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和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许德珩都出席指导；九三学社的许多宣言稿和意见书都由许德珩组织起草，并征求各地社员意见。

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后，九三学社的同志因工作关系，散布国内外各地，尤以北平、上海、南京、重庆的社员最为集中。九三学社也主要在这四个地方发展成员，开展组织活动，从而形成了社务工作的四个活动中心。褚辅成在1946年6月迁往上海后，负责上海的社务工作；许德珩在1946年10月迁往北平后，负责北平的社务工作。在这一时期，褚辅成和许德珩好比九三学社最高的两座山峰，共同引领着九三学社的发展。因此，单独以这个时期的褚辅成或者许德珩的行踪为参照，判定总社迁往北平或上海，都是不妥当的，同时也是不符合许德珩致笪移今的信函所反映出的史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11月后，褚辅成和许德珩在社内的这种双峰地位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许德珩对记者明确表示“渠个人不拟赴京”[3]，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得到了社内外同志的充分认同。褚辅成则先表示“最近不拟赴京”[4]，“主张延期的”[5]，但后又错误地出席了“国民大会”。这直接影响到他在社内外的声誉。笪移今在回忆褚辅成这一段经历时说，“由于年迈软弱，在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的花言巧语的诱骗、蒙蔽下，未能坚持己见，他和孟宪章错误地出席了伪国大。九三上海的同志得悉此事后，立即致书褚、

1. 邵鸿：《许德珩年谱初稿》，未刊。
2. 谢纲槐编著：《最近中国之党派》，江西尖兵半月刊社1947年版，第121页。
3.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4日。
4. 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5日。
5. 《申报》，1946年12月17日。

孟两人，陈述利弊，力促及早回头。他们在会议进程中逐步感到失望，大会未结束就退席回沪。”[1] 与褚辅成一同参加“国民大会”的孟宪章后来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也专门检讨说，“深念此为一生莫大污点。”[2]。吴藻溪甚至因为此事专门致信许德珩，“提议开除褚、孟的社籍。”[3]

因为没有处置明文，许德珩未同意吴的提议，但他在1946年12月给笪移今的信中表示，“以后沪上关于社务问题，拟请兄及藻溪兄多负责任，并商量经常通信方法。目前社员方面似觉散漫，南京方面拟请水叔兄多负责任。”[4] 这可表明，许德珩此时在社内已经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实际上承担了协调社各地组织关系的职责。

很可能因为受出席“国民大会”之事的影响，加之年老多病，褚辅成此后除召集过社员及其他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外，未见其再组织九三学社的其它活动。笪移今和吴藻溪则更多地担负起上海社组织的工作。

在1946年11月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德珩领导北平社组织开展了许多工作，与褚辅成相较，他这一峰呈逐渐凸起之势。1948年3月，褚辅成因病逝世，至此，九三学社之中更无可与许德珩比肩的人物。

五

如前所述，1947年3月，许德珩曾致信笪移今“拟请沪上朋友讨论”总社的地方问题之事。那么，上海社组织是否讨论了总社的地方问题，讨论的结果又如何呢？

根据九三学社中央最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上海社组织“曾提议以北平为本社总社所在地。”北平社组织收到上海的提议后，于1947年5月4日制作了征求意见表[5]，征求各地社员对于总社设于何地的意见。

1949年12月，笪移今、孟宪章还专门就这段历史写下了一段文字：“在1947年5月4日，本社成立周年日，北平社友纪念庆祝，曾决议征求各地社友意见，决定总社所在地。结果多赞成北平”。

笪移今是当时上海社组织的负责人，孟宪章是社中央理事，他们作为亲历者，其“多赞成北平”的回忆同北平社组织就总社设于何地征求意见一事可以相互印证，因而可信度和证明力是极高的。

如果还有同志对笪移今、孟宪章回忆的准确性有所顾虑，那么，以下六个方面则可以进一步印证其回忆：

首先，社内同志的认可。吴藻溪在1949年8月13日给詹熊来的信中写道，“九三学社应如何办，请等待北平总社指示，目前谈不到接受新社员入社。”[6] 孟宪章在《中国反美扶日运动斗争史》中说，“从1948年春开始，对日问题座谈会乃进一步扩大范围，并一变开始时的温和态度，改采积极的尖锐的斗争姿态。自后，所发宣言在上海则通过大教联（特别热心的是李正文、张志让、曹未风诸先生），各民主党派（如施复亮、杨卫玉、宦乡、陈仁炳、李世璋诸先生），在平、南京则通过九三学社总社及南京分社（由笪移今与许德珩、袁翰青、潘菽及厦门大学罗志甫诸教授联系），在穗、渝、汉等地则通过私人关系，妇女届则由曹孟君、孙荪荃负责，广泛征求签名。”[7] 笪移今在其回忆九三学社的文章中，亦专门引用了孟宪章的这段话。[8] 这些史料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前，吴藻溪、孟宪章、笪移今等上海的同志就完全承认了北平的总社地位。翻阅社内的其他创始人或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如潘菽、金善宝、谢立惠、袁翰青等人的文章，也从未发现他们对这一时期的北平的总社地位有过质疑。

其次，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北平和平解放前，许德珩所领导的社北平组织，积极联络北大等高校的

1.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编：《上海九三学社专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7年版，第5页。
2. 丹江口文史资料编辑室：《丹江口文史资料第五辑》，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9年版，第71页。
3. 九三学社中央宣传委员会编印：《九三社讯》1952年9、10月号，第44页。
4. 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5年第1期，第14页。
5. 见本期图页。
6. 郭悦主编：《社史研究通讯》，2015年第1期插页。
7. 孟宪章著：《中国反美扶日运动斗争史》，中华书局1951年版，第26页。
8.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编：《上海九三学社专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7年出版，第16页。

教授，做了大量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如发表宣言，教授签名运动，参加学生游行，营救被捕学生，掩护处于危急中的进步学生等等，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认可。1948年4月，毛泽东在给刘仁的信中说，“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1]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2]成立联合政府有关问题。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中，列出29位拟邀请赴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许德珩名列其中。他也是该名单中唯一的九三学社社员。1949年初，周恩来专门指出，“九三学社，凡知北平民主运动的人，均知为北平以北大为主的进步教授组织。”[3]1949年6月16日，在解释为什么没有邀请有些团体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时，周恩来表示是希望这些团体在地下工作上有所作为，“一个是北平许德珩先生领导的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的领导同志跟北平的地下工作同志是有联系的，曾经掩护过很多同志进行民主运动。当时我们还是期待着这个组织在北平继续开展工作，因为当时北平还没有解放。”[4]由这些文献可知，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眼中，许德珩就是九三学社的代表，许德珩所领导的社北平组织也相应地被视为九三学社总社。

第三，社会上及国民党有关方面的看法。郭衣洞（即柏杨）在1947年编著的《中国各党派》中，有一份介绍各政党的表格，即把许德珩单列为九三学社的领导人。[5]1948年11月，由国民党有关方面编写的《中国现有党派社团调查表》，同样把许德珩单列为九三学社的领导人。[6]

第四，这一时期九三学社发表的宣言、意见书等，大部分是社北平同志起草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九三学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也是许德珩等北平的同志起草并于1949年1月发表的。

第五，从1948年秋到1949年3月间，卢于道、梁希、潘菽、涂长望等社员先后被接送至解放区，并抵达北平。此后，随着新政协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先后召开，多名社员会聚于北平。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北平的总社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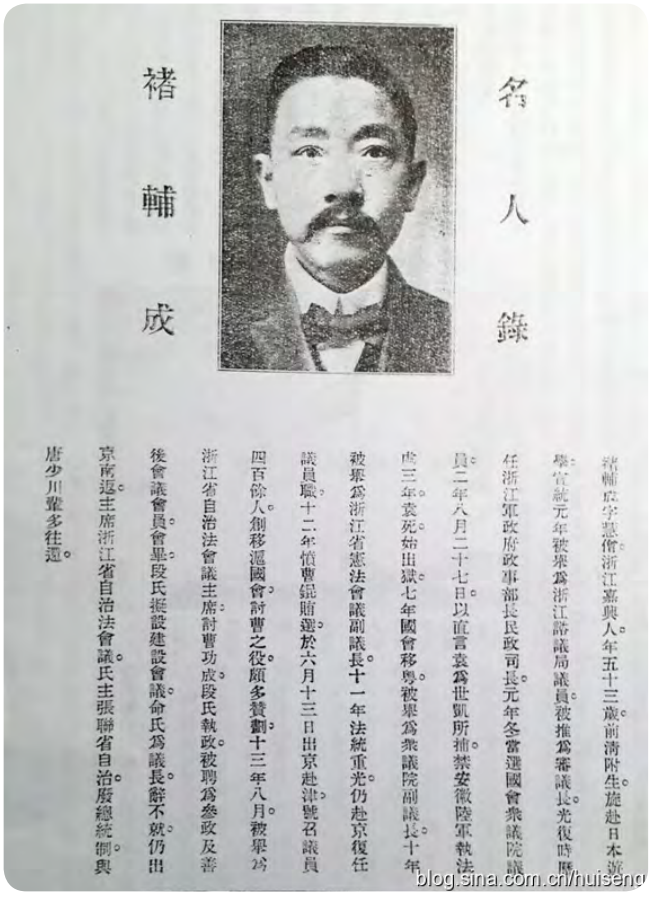
许德珩致笪移今的信、北平社组织征求总社所在地的档案，笪移今、孟宪章的回忆文字，前述许德珩与褚辅成在社内地位的演变，再加上前述六条理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根据这个证据链条，我们可就九三学社总社问题得出如下基本结论：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九三学社各位理监事及社员也先后回迁，散布于国内外各地，尤集中于北平、上海、南京、重庆四地。九三学社在北平、上海、南京、重庆四地积极发展成员，开展组织活动，形成了社务工作的四个活动中心。但在此后约一年左右的一段时间里，九三学社未明确总社所在地。1947年5月后，经上海社组织的提议，并征求各地社友意见，北平被正式确立为九三学社的总社所在地，同时也进一步确认了许德珩的领袖地位。

1. 指张东荪和符定一。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3. 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一辑》，第232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5. 郭衣洞编著：《中国各党派》，祖国文化馆1947年版，第91页。
6.《党派分析+中国现有党派社团调查表》，河南省档案馆，档号：M0002-006-00174-022。

褚辅成与中共创始人的交往与友谊

王天松


名人錄

褚輔成

褚輔成字慧僧浙江嘉興人年五十三歲前清附生旋赴日本游學宣統元年被舉爲浙江諮議局議員被推爲審議長光復時膺任浙江軍政府政事部長民政司長元年冬當選國會衆議院議員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以直言袁爲世凱所捕禁安徽陸軍執法處三年袁死始出獄七年國會移粵被舉爲衆議院副議長十年被舉爲浙江省憲法會議副議長十一年法統重光仍赴京復任議員職十二年憤曹錕賄選於六月十三日出京赴津號召議員四百餘人倒移滬國會討曹之役頗多貢劃十三年八月被舉爲浙江省自治法會議主席討曹功成段氏執政被聘爲參政及善後會議會員會畢段氏擬設建設會議命氏爲議長辭不就仍出京南返主席浙江省自治法會議氏主張聯省自治廢總統制與唐少川輩多往還

blog.sina.com.cn/huiseng

民国名人录

在我搜集的褚辅成史料中，有一份《民国名人录褚辅成》，这是1925年褚辅成53岁以前的履历，照片应是辛亥革命后担任民政长时所摄。西装领结、山羊胡子，英俊潇洒。名人录中介绍褚辅成的简历从前清附生、留学日本，一直到1924年的省自治法会议主席乃至1925年善后会议会员。大约分为四个阶段：1904年留学日本到辛亥革命后任浙江民政司长；从民国二年出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到辅助孙中山广东护法；从孙中山当选总统，到褚辅成回浙主导浙江省宪；从法统重光重入国会，到1925年的善后会议会员，褚辅成前半生奔波四个阶段，其中一次入狱，两次历险，都有性命之忧。在这份 民国名人录中没有列举褚辅成保释中共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事，或许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十分隐密的事情，不为外界社会所知晓。褚辅成与中共创始人的交往与友谊还得从1921年保释中共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事说起。

保释中共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

1921年8月初，在嘉兴市区张家弄鸳湖旅社住进了12位神秘的外地旅客，第二天，他们离开旅社，在城东南宣公桥堍[1]雇一游船，向南湖划去，不多时游船便隐没在湖面的空朦之中。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从那里来，他们又要到南湖去干什么？不得而知。

嘉兴，东临上海，西接杭州，北靠苏州，交通便利，是闻名江南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和平常一样，南来北往的旅客每天陆续不绝，这12位神秘旅客的到来，波澜不惊，并没有给嘉兴城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影响。

28年后，1949年5月27日，嘉兴城头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落下了，代之以升起的是一面色彩鲜艳的五星红旗，嘉兴换了人间。

1991年，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建成，[2]并对外开放。自此每逢中共“七一”建党纪念日，一批批来自外地或当地的中共党员，来到纪念馆纪念党的生日，重温革命先辈的斗争经历。我们在讲解员的娓娓讲解声中，终于解秘。1921年8月初的这一天，这12位神秘的外地旅客来到嘉兴，他们在南湖游船上成立了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是近代以来发生在嘉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1. 如今，在嘉兴东环城河宣公桥处，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12位代表塑像已经成为嘉兴城市的亮丽一景。

2. 南湖纪念馆最早建立是1960年，建馆之初在湖心岛，改革开放转型后，南湖成为旅游风景区，1991年7月，中共建党七十周年前夕，嘉兴人民捐款350万元，在南湖东岸重建纪念馆。2006年在再建新馆。

但是，二个月后中共第一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就被法租界捕房逮捕入狱，是嘉兴人褚辅成与国民党另一位重要人物张继一起出面保释，才获出狱。然而，由于陈独秀在担任了五届中共总书记后被清除出党，中共建党历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淡出党史记录，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党史讲解中亦无此条内容。关于褚辅成保释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事，还得从头说起。

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召开，因被法租界捕房察觉，他们转移到了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进行。8月2日会议闭幕。[3] 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计划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局成员，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此时陈独秀还在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任上，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后，陈独秀离开广东前往上海，从事中央局书记的专职党务工作。二个月后的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在法租界居所被捕。被捕的理由是“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4] 被捕当天陈独秀未被认出，即被带入捕房。当天下午5时许，褚辅成与邵力子到陈独秀居所探望，亦被误捕并被带入捕房。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仲甫”是陈独秀的字，过去在知识界的交往中，互相熟悉，友谊较深，大多以对方的字或号称呼。由于褚辅成的大意，一声“仲甫”就把陈独秀给彻底暴露了。褚辅成和邵力子在弄清身份后就释放了。陈独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被捕后上海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与张继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陈独秀人被放出来了，但要随传随到，二十多天后又会审，说陈独秀宣传赤化，最后定案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经过马林的种种活动，结果罚款五千元了事。[5] 从对陈独秀定罪的这个结果看，当时法租界捕房对陈独秀中共“中央局书记”的政治身份并不知晓，否则，断断不会如此轻判、轻罚了事。今天来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个刚刚新成立仅二个月的政党，其党首就被捕入狱，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有解散之虞。所以自从这件事情以后，让中共从此记住了褚辅成这个名字，更记住了褚辅成这个人。

人们也许会问，褚辅成与陈独秀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是怎么交往并建立友谊的？其实，褚辅成在与中共创始人的交往中，陈独秀是他熟识、交往最早的一位。从以下几个时段的交往，我们可以看出褚、陈两人之间的友谊。

远在1909年，作为同盟会浙江支部长的褚辅成，以浙江革命运动全局性眼光谋篇布局，推动浙江革命运动时，陈独秀在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教习，就参加了反清活动，曾作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6] 由此可见，早在辛亥革命之前，褚辅成与陈独秀就熟识，他们是反清革命的战友，由此，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17年3月始，褚辅成与王正廷等100多议员因反对对德参战，从益友社分离，筹组政余俱乐部，于5月6日在北京象坊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决定发表宣言书，陈独秀与胡汉民、吕复即是大会宣言书的起草员。[7] 据史料记载：政余俱乐部的干部人物除王、褚以外，有胡汉民、彭允彝、吕复、陈独秀诸人。” [8] 在对德外交问题上，陈独秀认为：“此次对德外交问题，乃国家存亡问题，不可已寻常外交规之”，“此次对德外交，为国家存亡盛衰之唯一问题”。当5月15日国务院再次以对德宣战案咨送众议院，褚辅成坚决反对。5月19日出席众议院会议讨论对德宣战案时，褚辅成提出“暂从缓议”之动议获得通过，对德宣战案终被搁置。褚辅成这一动议也是政余俱乐部集体意志的体现。在国家对德外交的重大问题上，陈独秀与褚辅成、王正廷等的观点始终保持一致。

1921年3月，应陈炯明之邀，陈独秀赴广东，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即相当于后来的省政府

3.《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第164页。现多数党史学者采用此说。

4.《申报》1921年10月6日

5.《包慧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第371、372页

6.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褚辅成文存》，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67页

7.《申报》，1917年5月9日

8. 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第6辑第60页

教育厅厅长）褚、陈两人又在广东相聚，不过这次两人在广东相聚的时间不长。4 月 7 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褚辅成于月底离开广东回到上海，5 月，投入浙江省宪运动，期间来往于沪杭之间。[9] 如前述，8 月初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后即离开广东赴上海，从事专职党务工作，这一时期褚、陈两人又都在上海。毫无疑问，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正常联系和往来。这在 10 月 4 日陈独秀被捕那天，褚辅成与邵力子到陈的居所探望被误捕就是最好的印证。

有地方文史学者甚至撰文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被巡捕房窥破后，之所以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开会，是因为如果再出现安全隐患时，可以得到褚辅成的保驾护航，为南湖会议提供安全保障。[10] 事情固真如此？目前虽然还没有直接的史料佐证这样的猜想与推测存在，但是，历史巧合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考证空间。

总之，保释陈独秀一事，使褚辅成从此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建立起了良好信誉，由此奠定的友谊基础，褚辅成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与中共有了更多的交往与合作。

二次主浙，与中共合作施政，被捕入狱

1926 年 7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7 月 9 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1927 年 1 月，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国民党浙江政治会议在宁波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派张江静等为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并以张为主席。张未到前，由蔡孑民（元培）先生代理。下设政务及财政两委员会，政务委员会亦以张为主任委员，张未到前由褚辅成先生代理。褚辅成奉命第二次主持浙江省政后，在宁波设临时省府于道尹公署，2 月，任沈钧儒为临时省府秘书长。3 月 1 日起在省城行使职权。[11] 就在本月杭州发生了工潮，虽经褚辅成、查人伟等人的调解，形势有所缓和。[12] 但是，在工潮发生后的双方（总工会与职工联合会），由于根本利益上未能彻底解决，不久，形势再度严峻。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工潮的发生引起蒋介石的深切关注，4 月 3 日，蒋介石召褚辅成到沪，报告省政。[13] 蒋介石此次召褚辅成到沪，名为报告浙省政务近况，实为了解杭州发生工潮一事。对于处理杭州新旧工会发生的冲突，褚辅成站在公正立场酌情处置，使形势得到缓和，而蒋介石接到的报告却并非如此。事实是由于杭州市公安局长章烈等人的明显偏袒，造成了形势的再度紧张。他们对（中共领导的）总工会代表提出的先解散（反共人士杜震芗组织的）职工联合会再复工一事，以“此系政务问题，彼为军人，未便干涉”为由推托，而要求“即行复工，暂禁游行集会”，故引起总工会代表的不满，遂向省政府提出五条要求：（一）撤换章烈；（二）解散职联会，并惩办杜震芗等；（三）发还纠察队用器；（四）惩办指使开枪者；（五）抚恤此项死伤者。对此要求褚辅成代表省政府逐条答复：“撤换章烈，省方本无问题，因彼屡抗命令，惟在军事时期，须得蒋总司令同意；解散职工会，省方早下令公安局解散，乃该局长托故请假，已再令代理局长讯即解散；至于惩办工贼，决令公安局惩办；纠察队器械俟向总部交涉发还；至惩办指使开枪者，事关军事，须由军事当局办理，对受伤者决即派员慰劳。抚恤一项，严令肇事者负责。”褚辅成的答复得到总工会代表的谅解，但引起公安局长章烈等人不满，他们密告蒋介石，褚辅成袒护工人，有“通共”嫌疑。[14]

1927 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江山初定，由于国民党内新老两派势力激烈的权力争斗，使在国民党内资历甚浅、地位不高的蒋介石感到威胁；同时，自北伐以来中共显示出对工农的强大号召力，更让既想通过联俄、联共发展自己的势力、又要处处提防限制中共力量发展

9. 王天松编《褚辅成年谱长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275——291 页

10. 陈伟桐著《发祥地——嘉兴及浙江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视角》，嘉兴文史总第 77 期第 92 页

11. 王天松编《褚辅成年谱》下册，学苑出版社第 504 页

12.《浙江百年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203 页

13.《申报》1927 年 4 月 5 日

14. 王天松编《褚辅成年谱》下册，学苑出版社第 506 页。

的蒋介石感到矛盾而忧虑；在浙江，褚辅成主持省政期间与中共委员的通力合作施政，蒋介石亦颇为不满。据马叙伦回忆：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职委员外，（褚辅成）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15] 那位年青的委员即是宣中华。而在省政府的各个部门内还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担任着相当的职务。总之，错综复杂的形势，让初定江山的蒋介石深感政权的不稳，自身权力受到威胁，决定“清党”。

1927年4月11日清晨，杭州市公安局长章烈奉蒋介石密令，先于上海“四·一二事变”一天，率领大批军警袭击了省党部、总工会，搜查了著名共产党人的住宅，逮捕革命者，是为“杭州四·一一事变”。[16]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标志着“清党”全面开始。事变发生前，已有消息透露，省政府和省党部的委员，除褚辅成、阮性存、沈钧儒几人外，全数逃避一空。曾有人通知褚辅成，叫他赶快逃走。他说：“我不逃”。又告诉他，清党捕人是蒋介石的命令，褚辅成自信地说：“蒋介石也杀不了我，不须逃”，结果于4月14日被公安局长章烈亲手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老友沈钧儒。[17]

褚辅成的自信是有道理的。1911年辛亥革命时，褚辅成是浙江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蒋介石仅是陈其美派来杭州协助褚辅成光复杭州、攻克抚署的一名敢死队的队长；[18] 杭州光复浙江军政府成立，褚辅成任浙江军政府政事部长（相当于省长）。[19] 蒋介石回到上海，仅在上海督军陈其美手下当了一名团长；20年代蒋介石在上海做交易所经纪人时，[20] 褚辅成是广东护法国会众议院副议长，是辅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实际主事者之一。褚辅成自信，蒋介石决不会向他这样的人动手。

但让褚辅成始料不及的是，在大逮捕前已经有人诬告他为“共党”，诬告者的证据是在宣中华的抽屉中搜得有“褚辅成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一函，[21] 虽然后来查出共党宣中华的日记所记和褚的交往系属伪造，[22] 但褚辅成戴着“共党”红帽子的嫌疑，终于未能逃过一劫。其实，早在当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克复杭州后，在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上褚辅成就遭到攻击，当时东路军政治部的代表就攻讦褚辅成：“我们国民革命军流血，联省自治者做官”。褚辅成是历史上有名的“联治派”。“自治”和“联治”在军阀连年争斗割据的年代里，为“保境安民”求得一方民众的安宁所盛行的一种思想，当年为知识界众多著名人士所接受提倡。想不到数年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隐私和短处来攻击他。

褚辅成与沈钧儒遭逮捕后，被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囚禁期间褚辅成丝毫不为自己遭逮捕的危险处境考虑，却念念不忘在任期间未能在全省举办农业银行一事而感可惜。[23]4月21日，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同被解往南京。两天后，蔡元培、庄崧甫等人赶去南京，要求蒋介石释放褚辅成。

褚辅成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者，此时蒋介石也知道，褚辅成不大可能是“共党”，只是在他主持省政期间与中共人士走得太近了，就说：“慧老在这里原本没有什么，我只是想问问他浙江的一些情况。”[24] 蒋介石的话听似平淡，其实里边隐含着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褚辅成第二次主政浙江，既受同代中宵小的嫉忌诬陷，也受国民党新生代的排剂打击，任职时间仅一个半月，即被蒋撤免。当时环境之复杂、时局之险恶，褚辅成看得很清楚。国民党内的权力争斗一贯的手法，是给对方戴上共党的“红帽子”，被戴红帽子的一方百口莫辩，政治上

15.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出版社第94页。
16. 张瑛《蒋介石“清党”内幕》国防大学出版社第194页。
17. 骆正葵《慧老往事数则》，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8、49页。
18.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褚辅成文存》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69、570页。
19. 台湾阮毅成《记褚辅成先生》，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8、49页。
20. 骆正葵《慧老往事数则》，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8、49页。
21. 沈钧儒《楼居七日记》，《浙江月刊》，第1卷第4期。
22. 王梓良《记忆与伤逝》，第41页。
23. 沈钧儒《楼居七日记》，《浙江月刊》，第1卷第4期。
24. 骆正葵《慧老往事数则》，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49页。

《牟小东文集》编后记

李　书

受牟小东先生的女公子牟钢、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江力先生重托，今年 8—10 月中旬，我承担起《牟小东文集》编辑工作。经过紧张、忙碌、艰辛，《牟小东文集》即将付梓。面对着他的每一篇行文，似乎又在和他神交。多少年过去了，和他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山南海北说说笑笑的日子，历历如昨。

我和牟小东先生认识，缘起九三学社。“牟公”，——我还是习惯这样称呼他。因为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和社北京市委机关上上下下无论老少都叫他“牟公”。尽管听他多次在介绍自己时强调“我姓牟（mou，第二声），释迦牟尼的牟呵”，可是来往之人似乎都不理会或根本忘掉了他所强调的发音，叫他“牟（mu，第四声）先生”或“牟公”，他也总是应着。习惯就这样成了自然。

在启功先生的推荐、介绍下，1983 年我来到九三学社中央，尽管其时我的一些青涩、稚嫩的作品已发表了，但是能否被九三学社中央录用则需要进一步地考核。面对严格的文、史、哲方面考试，兴许是我发挥超常，特别是我对现当代文学作品、作家的认识和评述，考官们甚为满意，当即拍板让我即刻办理调任手续。孰料，鉴于当时体制，那纸调令公文还在繁琐的点逗划圈层层审批的漫长旅行过程中，九三学社中央一副秘书长同我谈话后，认为我棱角过于鲜明，尚待时日磨去，还不适合做统战工作。我高兴的笑脸一下子变成了哭脸。我也不知牟公怎么知道的，听说他径直去找了那位副秘书长理论，争吵厉害，还红了脸。后来，《红专》编辑部的宋大姐专程到我家，送来了牟公让我火速去九三学社中央报到上班的亲笔信。现在想来，也正是牟公的仗义使我又重拾起信心和对未来的憧憬，跨进了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的大门。这是我在经历了农村插队、工厂工人，十几年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遍尝人世间辛酸苦辣的砥砺后的人生重要转折点。

我到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后，先是在九三学社中央组织部工作有一年半左右，后因撰写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安振东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凡的事迹被领导调到了宣传部工作。那时我还不是牟公的兵，在一些宣传工作会上他以我这篇文章为例总结经验：“介绍安公振东的事迹，全国各地都已有文章见诸报刊，这文章还能怎么写？可我们新招来的年青人突破了，成功了，这我没有想到，说明我还很保守。这篇文章为让更多的社员了解安公及了解、认识九三学社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和内参，都是以她这篇文章作为基础参照写的，评价不俗。”牟公还为我特去找上级领导批了 20 元钱作为鼓励我再接再厉的稿费。当然，这些都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

必死无疑。作为资深一代正直的老国民党人褚辅成，他不愿与此争辩，离开这是非之地，去开辟一片为国效力的新天地，何尚不是解脱的最好办法。当蒋介石假以道歉的口气征求褚辅成个人意见“愿就何种职务”时，旰衡时局，褚以“愿以在野之身，兴办教育，有余力为政府谋贡献”相答，[25] 褚辅成的选择是极其明智的。一周后褚辅成获释，从此离开政坛，息影于上海，致力于社会公益、文化教育、慈善救灾等事业。特别是与章太炎、董康、王开疆等人创办的上海法科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法学人才，贡献尤多。上海法科大学后来改为“私立上海法学院”，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道、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26]

1931 年 9 月东北“九·一八”与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枪声响起，褚辅成看清日本帝国主义有并吞全华的狼子野心，走出书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这已是另一个话题了。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25. 王梓良《褚辅成先生的一生》，台湾《浙江月刊》，1979 年 5 月第 121 期。

26. 褚律元《一位爱国的政治活动家——纪念祖父褚辅成》，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三辑《褚辅成专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8 页。

我作为牟公麾下一员小兵，在宣传部干了约有四、五年的时间，对他的为人、个性、才干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和熟悉。

牟公祖籍山东福山（今烟台市），1921年生于北京。身材伟岸，相貌堂堂，目光炯炯，声如洪钟。按他女儿牟钢形容，挺帅的。

牟公出身世家，六岁开始念私塾，从小受其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的陶冶熏染，在不寻常的文化环境中长大。这个家族中，近代著名史学大家柯劭忞先生（1850—1933，字凤荪、凤笙，号蓼园）是牟公的表爷，长其两辈，同牟公的父亲是至交。柯劭忞先生是元代著名的学者和画家柯九思的后裔。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试中进士，后进翰林院任编修。曾伴宣统皇帝溥仪读书。在经、史、小学、诗文、金石、历、算，许多方面均有极精深的造诣。清王朝覆灭后，柯劭忞先生痛哭流涕，坚决不剪辫子，一直以清遗老的身份隐居不仕。1914年清史馆在北京成立，柯劭忞先生应聘为《清史稿》的总纂。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元史》的重修。历时30余年完成的257卷150多万字的《新元史》是他最著名的丰功伟业。《新元史》集明、清学者研究元史之大成，以一人之力而成此巨著，实在让人仰视。这部史书，后来被列入“二十五史”之中。1925年10月，柯劭忞先生又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提要》等。

牟公的家族成员中有著名文献学家、词学家、词人孙人和先生（1894—1966）。他曾任中国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辅仁大学名誉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建国后担任中华书局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哲学组成员。擅长于词章和考据，精于校雠之学。著作有《论衡举正》、《吕氏春秋举正》、《吕氏春秋举正（续）》、《人物志举正》、《韩非子举正》、《鹖冠子举正》、《墨子举正》、《三国志辨证》等多部。

在牟公的家族成员中，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史学家——中国史学会创建人之一，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及中国通史、史学理论研究等学术领域作出杰出成绩的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1909—2000），他所主编的《中国通史》是迄今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中国通史。

对牟公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年长于他13岁的长兄、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牟润孙先生。牟润孙（1908—1988）先后师从柯劭忞、陈垣、顾颉刚先生。柯劭忞先生与牟公父亲友情深厚，牟公父亲去世后，柯劭忞先生晚年在家讲学，不仅让牟润孙去听讲，还把他收为可以执经问难的弟子。当时牟润孙先生21岁，是柯先生门下最小的弟子。后牟润孙又在陈垣、顾颉刚等先生门下学习治史方法，目录之学日益精深，涉猎的史籍也愈加广泛，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所著《注史斋丛稿》、《海遗杂著》等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也影响至巨。

试想：一个家族中有如此众多重量级的文史大家，对牟公的熏陶、影响也是超大超强吧。

我对牟公的第一印象除了仗义，还有敢言、霸气，聪颖、有才，爱才。

大概是因在宣传部门，那时没有电脑，每天都有各类文稿、参考资料和用书及一堆会议的筹备工作文件摆满案牍。他对年青人要求很是严格，容不得马虎、脱误。尤其文字工作，不能有硬伤。哪怕是会议记录、出简报，他若看到你在会上愣神儿，不管是哪个部门的，他的批评毫不留情面，有时甚至高腔大嗓指名道姓，责问你为什么精神不集中？这文章怎么写的？会不会写？能不能写！更要命的是有时语言还有点损，让人脸上挂不住，直接得罪了人，——才不管呢。有时他还会把意见带到领导们的碰头会上开诚布公讲一通。隔墙有耳，有些人同他关系淡了，远了，耿耿于怀。也于此，牟公任职期间不断有人流动出了宣传部。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评论他时所说的“霸气”？

之所以“霸气”，是因为有才，是因为牟公各种文章全能招呼并倚马可待，这是他给我的第二印象。但凡有本事的人，总显得有些“另类”或“霸气”吧。可能牟公认为很轻易的事，别人不见得就觉得像他那样容易；可能牟公对于文章要求高，别人体会不到也较难做到。有的人认为牟公不过“才高八斗”，牛什么？犯不着盛气凌人；有的则认为牟公心性直白、率真。因为我也从事过牟公所从事的工作，深知文字工作的不易。尤其是在党派中央机关里作宣传文字工作政治性很强，牵涉党的方针、政策，不仅要在很短时间内理解、消化，还要往上报或者见诸报端，哪怕是内部刊物。有些文稿，为核正史实必须字斟句酌，保证表达准确，虽费周折，但不算难。难的是有时上级布置下来的意图要求同内心所感是拧着的，逢此我常半天进入不了状态，头痛。说来惭愧：我的公文写得最差，只

会生搬硬套什么“当否请示”，什么“专此布复”。在牟公直接领导的宣传部工作几年，楞没能熏陶出来。但牟公始终头脑清醒，思路敏捷，以博学多识，睿智及丰富、生动的语言和古文功底称霸宣传部，达到了“打败天下无敌手”境界。多么难写的文章到了他的笔下，举重若轻，好像行云流水，轻松自然，又那么通畅。

他的才，表现在多方面。牟公1978年起兼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德珩的文字秘书有十年光景，其间帮助许老记录、整理、出版了由邓小平题签的《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许老的经历特殊、丰富，为研究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风云变化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作中位置显豁，被研究者广泛引用。这部回忆录史料翔实，思路缜密，文字流畅，十分耐看。这部书无疑也凝聚着牟公大量心血。

他也很爱才、惜才。喜欢同年青人交往。家里经常聚集按现在话说就是文艺青年。我见过的。有的年青人起先同他还不是很熟，但一会儿他们就能聊得热火朝天，高谈阔论，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了距离。话题也极其宽泛，探讨时政，纵论天下，文章的出处、历史典故、某某的逸闻趣事……牟公鼓励他们投稿并帮助他们联系出版发表的单位。这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后来都成了牟公的好朋友。如今他们虽也已进入古稀之年，但对自己成长路上牟公的热情相助始终不能忘怀。

牟公是“性情中人”，也好开玩笑。宣传部门人来人往，不止一个人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德珩念成“许德衍”，把副主席郝诒纯念成“赫治纯”。由于牟公兼任许老（德珩）的文字秘书，有时工作需要两头跑，好多次外出去许老那儿，他就会和我们说一声“我到‘德衍’那儿。”有时谈到参会主席、副主席，我们也会报告“今天‘德衍’、‘赫治纯’都来了……”。我们的玩笑只有在宣传部的人能够意会，也曾与牟公议论过，担心这种玩笑成习惯，会真成了“白字先生”。

牟公1953年到九三学社工作，1989年退休。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海外联络部副部长、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他退休后全身心地从事佛教事业，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佛教协会理事会名誉会长、北京佛教居士林副理事长等职。

《牟小东文集》一共收录了79篇文章，分“随笔、杂谈与人物专访”、“明清近代史研究”、“佛学研究”三部分。牟公使用过的笔名有：小东、百里、樊任等。

在第一部分“随笔、杂谈与人物专访”中的49篇文章中，牟公笔下的人物有22个，绝大多数是九三学社社员。一方面是工作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他兴趣所致。这部分文章充满热情，有张力却又舒缓平易，不枯燥乏味，读起来很觉亲近。

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在其组织形成、壮大成长过程中，不仅有国内外顶尖级的自然科学家，像梁希、金善宝、周培源、严济慈、茅以升、王淦昌……，也不乏诸多海内外驰名的社会科学家，如许德珩、黎锦熙、刘文典、雷海宗……。他们的命运同时代脉搏一起跃动，是国家的名片。牟公用笔用心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记录下不少这些人物的故事，今天重新阅读，穿越时空，仍能给后人以启示和影响。

这部分在编排中多以人物生年为序。有些文章虽是写的同一个人，但角度不同，笔法各异。文笔如其话语一样简洁、明了，潇洒且老辣。如写毛泽东的老师、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参加1919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九三学社第一至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俞平伯；还有被张劲夫赞为“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等等。都是行文流畅，栩栩如生，个性突出。因工作关系，牟公留下相关的对许老的专访、侧记也较多，此次收录了他撰写的关于许德珩的文章计9篇，从1959年写下的第一篇访问许德珩到1991年最后一篇，时间跨度三四十年，印映出的时代特色较为鲜明。

第一部分文章在编排中，有少数是以类相从。如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先生都是地质学专家，虽有古生物学、史前考古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分，具体专业不同却相通。他们与“北京人”的发现、挖掘工作，关系密切。就把他们放到了一起。

对于个别文章也做了少许补充，如《记蔡元培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几封信》，原刊于1981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文中所说的四封信并没有刊出。在搜集到的牟公手稿中，发现牟公抄写蔡元培的三封信，但未完，为完整起见，方便读者查阅，特去图书馆寻找、核对、复制了文中所谈的四封信，作为附录，附在了该文后。

收录在文集第二部分“明清近代史研究”的文章计18篇，充满学术气息，折射出牟公的家学传统印记，以及其研究历史文化的很大潜质。以《明皇室的殉葬制》为例，短短一篇不足三千字的文章，标出其史料出处10个。又如《从万娘坟说起》一文，约有四五千字，出处竟达22个。层层推理，言必有据。我看过牟公一些手稿，文章的后面都认真地标明了资料的来源。此次搜集到的文章，有些已发表过，或许是当时因编写体例，文章后面的注释都拿掉了。牟公的这一部分文章，博闻强记，资料翔实，虽然是通俗的文字，却有观点，有史料，娓娓道来，给人的印象极深。如《〈聊斋志异〉中关于清兵在山东屠杀的史事》一文，旁征博引，有正史，也有野史，细致精确，小说与史料互证，无论从文学的意义上还是从清史研究的意义上都是可观的文字。《清孝庄后下嫁之旁证》，虽然其相关史料多人写过、用过，本是老生常谈，牟公却从亲历古迹清东陵说起，直观而亲切；以“风水墙”为立论核心，所论与清史专家孟森的观点不同，自是一家之言。《莫须有的‘故宫盗宝案’》，虽是参照了他大哥牟润孙先生《谈故宫盗宝案》的史料重新加工润色，而有些叙述却也自出手眼，可能是牟公表达对其兄长手足情深怀想的一种方式。

牟公从1953年至1989年在九三学社工作了36年，悠悠岁月似乎并不算短，但若把五六十年代各种运动不断的时间除去，能让他踏踏实实写东西尤其是写自己感兴趣的文字的时间并不充裕。文集第一、二部分的文字，大多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也有极少量是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所作。70年代末各民主党派逐步恢复正常活动。牟公曾说过，“80年代初，我的工作开始忙起来，有时星期天也要伏案写东西。”作为一名社务工作者，牟公在九三学社中央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起草各类公文；给领导撰写各种场合的发言稿、文字稿；宣传不同专业典型人物光辉业绩；介绍九三学社光荣历史、优良传统都是其基本工作。如果我们把精选出来的随笔、杂谈、人物专访49篇视牟公在九三学社这段时期上班、下班辛勤劳作为主业成果的话，那么在工余时间爱好研究明清近代史并撰写下他对人物、事件的考证辨析文论18篇则可看作是他副业产品。积少成多，水滴石穿。贵在坚持，他做出了不菲的成绩。

在编辑这两部分文字的时候，我想，人生有时真难以捉摸，难以驾驭，以牟公的才华和能力，以他的兴趣，假如他不是从事党派工作，而是如他的家族的其他人一样，从事文史工作方面的研究，一定能尽其才用，做出更大的成绩，说不定他的名字也会赫然在其家族文史研究队伍中占一重要席位。

《牟小东文集》第三部分是《佛教研究》。包括他所撰述的《印度佛教史讲授提纲》、编写的《烦恼的止息》，以及散见的同佛教有关的文章，计12篇。大多是在1989年他从九三学社中央退休后的作品。

牟公是居士，虔诚的佛教徒。他在一个信仰佛教的家庭中长大，出生刚一个星期的时候，一场大病险些夺去他稚嫩娇弱的生命，他的父亲为了给他祈福消业，把对中国近代佛教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印光大师倡导的《重刻安士全书》印行一千部广结善缘，终于化险为夷。牟公成年以后学佛，看佛教理论的书，逐渐对佛教有了兴趣。1942年秋，对《楞严经》颇有造诣的近代佛教领袖人物圆瑛大师从上海到北京广济寺讲经，牟公去听，由兴趣产生了信仰，念经拜佛，皈依佛门，法名慧慈。那时他失业在家，一有空暇除了去寺院听讲经，还经常到华北居士林（后改为北京居士林）参加活动。他曾管过居士林总务，虽然时间很短。牟公先后亲近律宗、贤首宗大德慈舟法师，天台宗大德倓虚法师、道源法师，聆听教诲，获益匪浅。同时他师事佛学家周叔迦、夏莲居居士研习内典和净土法门。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牟公退休，社务工作不再缠身，受幼时已牢牢地在心里生根的宗教感情的驱使，他不时地到当时北京居士林暂借广济寺开展宗教活动的地方，看望佛教界的老朋友。1993年，牟公到北京市佛协工作，开始忙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参与成立了北京市佛协佛陀教育委员会，并与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合作，组办佛学研究班和普及教育班。牟公和当时广化寺代理住持、现为广化寺方丈怡学法师分管教务与行政事宜。他们聘请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方立天教授为佛陀教育委员会顾问，组成规模庞大的师资队伍。强强联手的阵容中有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汤一介、许抗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晋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方广锠等先生。众多佛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广化寺作专题学术讲座，集一时之盛。

1996 年春，牟公以《四念处》作为一个专题，在广化寺连续讲了三个月，每次下课时，听众总是报以热烈掌声。

后来，学习班停办。大家时常追问能否继续开班？何时开班？可否尽早看到牟小东居士讲课书稿？在怡学法师的提议和催促下，牟公同意并编写出了书稿。1997 年底，他完成书稿时已是 76 岁的老人了。牟公在佛学方面精进努力，受到信众的喜爱，一方面是他聪颖，有宿慧，另一方面同家族传统文化熏染陶冶、佛教理念的教育自幼对他的耳濡目染，兼具儒教和佛教的童子功密不可分。

《烦恼的止息》是《印度佛教史》的一部分。是牟公根据泰•佛使尊者《人类手册》、苟嘉陵《做一个喜悦的人》、曦比丘《你的烦恼熄灭了吗》、释从信《阿含经止观》、庄春江《阿含经随身剪辑》、《原始佛典选译》等书编写而成。虽然是编著，但没有深厚的佛学功底和融会贯通的能力，是不可能把佛教中这么一个高深的学问，深入浅出地讲述出来的。宋人有言：“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牟公的《烦恼的止息》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诚如怡学法师在《烦恼的止息》即将印行时所说，这“是一本适合当代信众机缘的修行方法的最佳读物。它可以帮助读者彻底反省并认识到目前种种有偏差的修行知见与心态，以求得直接见到真正佛教修行的核心，而知道在众多的法门中走出自己的修行出路。”

限于时间和学识，在第三部分“佛学研究”中，我只改正了一些明显的笔误和错字，也订正和统一了一些提法。如，在《烦恼的止息》中，有时是“四念处”，有时是“四念住”，虽然本身无误，但在文集中应该有统一的说法，便径改为“四念处”。不过，也有一些原作或印刷品中的模糊不清的地方难以辨识，只能留待以后弥补缺憾了。

在许多人眼中，也许牟公缺乏留世的鸿篇巨制，算不上有学术专长的学者。但牟公一生勤勉，肯于做学问，肯于为民族文明进步，为祖国文化事业呕心沥血，尽自己之所能，这样的人本已是值得铭记，更何况牟公在政党文化、明清暨近代史研究、佛学研究与传承方面均留下了足资后人评说的专论文字呢。

牟公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今年适值中国文化书院建院三十周年。为表彰、纪念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各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书院决定选取导师们代表性文章集结成册，牟公荣膺其中，非常荣幸我也忝在编辑之列。《牟小东文集》的编辑出版是同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江力先生、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先生，九三学社中央档案室闫士萍女士和人事处洪柳女士所给予我的极大信任、鼎力相助分不开的！也是同牟公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女公子牟钢的倾力支持分不开的，她对这项工作所倾注的对父亲的深挚的爱和绵绵怀念使我很感动。

牟公晚年，头脑清晰，精神矍铄，九三学社中央曾分派我去做他的口述史，我们又有了更多的交流。没想到世事多变，当已有了前期成果时却因牟公的突然生病摔倒、昏迷、去世而中断。我去看他，精神好时，聊起我们的工作还要继续，希望他快点好起来；聊起他所研究的成果，我曾建议让家人帮着把他所写下的文章都找出来，还表示“说不定将来有机会我帮您整理、编辑成书呢”。他笑着说：“能成，当然好呵！我又觉奢望，这是梦呵”。意料之外的是，在他辞世 3 年后的今天，竟然鬼使神差般让我接受了整理牟公遗著的使命，我真成了把他当时的笑谈变成现实的人之一！

义不容辞和尽职尽责并不能必然尽善尽美。牟公的文章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由于大都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之前所写，好多无法进行电子检索；文章有的家属知道，有的不知；有的文章有手稿存底，有的没有任何存底；有的文章残缺不全，有的文章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如：牟公以“樊任”为笔名写的《香妃故事之谜》，只有“下”，没有“上”；手稿《忆魏建功先生》有头无尾，没有最后页。我和牟公在 2008 年最后的合作——撰写了一篇（6000 余字）对中国著名心理学潘菽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文章怎么也找不到底稿，发表在什么杂志、什么报纸一时也难以追索。这些都只能付之阙如。这些遗憾，在本书杀青之际，尤使我心潮难以平静，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进去。

我有幸能够拜读、通览、整理出牟公留下来的文字，为其编辑文集，并和我铭感终身的人们一起共同实现了牟公的梦，牟公地下有知，当为欣慰。我想，牟公和其好友汤一介先生会知道的，知道其身后仍有着数不尽的学人在继续努力奋进，并脚踏实地一步步践行着实施着他们始终在追逐的希望国家富强、民族兴旺、文明不断进步之理想，他们当会含笑九泉！

2014. 10. 30. 再修订；11.3. 最后定稿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社史人物



黎锦晖（1891 — 1967）

生于湖南湘潭，是我社重要创始人黎锦熙的弟弟，1957年2月6日加入九三学社。黎锦晖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他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家乡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湘剧花鼓戏汉剧等戏剧音乐对他影响至深。1927年，他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他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1967年逝世于上海。

1910年前在家乡读小学、中学，曾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学习民族乐器。使他从小受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熏陶。1912年长沙高等师范毕业后，在北京和长沙，任职员、编辑、音乐教员等。他重视民族音乐的教育、曾尝试着用传统曲调配上文言歌词以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与爱好。1916年参加北京大学音乐团活动，曾任《平民周报》的主编，这期间，他编写了两种歌曲集：一是《平民音乐新编》，以器乐曲为主；一是《民间采风录》，以声乐曲为主。1920年至1927年在上海主编《小朋友》周刊，创办中华歌舞专科学校。

黎锦晖青年时代醉心于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基于这种认识，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在大陆风靡一时，而且波及香港及南洋各地。《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等歌曲流传极广。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保护儿童创造才能、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导的学堂乐歌的传统。同时，他又是运用民间音乐素材的能手。在这些儿童歌曲里，民歌、小调、曲牌等均成为创作的素材。在歌曲创作民族化方面，黎锦晖无疑是一个先行者。继儿童歌舞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行音乐的创作。《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是他早期的流行音乐作品，标志着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

黎锦晖转入流行音乐创作并获得了成功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当时的上海已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黎氏的流行音乐便是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去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由于经费困难滞留于新加坡无法回国，他遂接受一家书局的订货，短期内编写了一百首流行歌曲寄回上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16本歌集。《桃花江》、《特别快车》等歌曲即成于此时，大获成功。“明月歌舞团”是中国流行乐发展中一个重要团体。中国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严华，流行音乐作家如黎锦光、姚敏都在这个团里。聂耳也是从这里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1931 — 1936年间，黎锦晖还为《人间仙子》等十几部电影配乐，其中的大部分插曲是流行歌曲。同时，他也搞舞厅音乐，把民间旋律爵士化。当时的“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大量录制出版他的流行歌曲。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相结合。在当时，主要有探戈、狐步等。配器也模仿美国爵士乐的风格。上举《毛毛雨》、《桃花红》、《特别快车》等作品格调不高，有的相当庸俗，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当时即受到广泛批评。聂耳就曾撰文斥责这些作品。可以说，中国流行音乐起步之初并没有走一条健康之路。除内容平庸外，音乐上的粗制滥造，演唱上的卖弄风情、嗲声嗲气都为其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在处理流行音乐中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歌曲创作除少数艺术歌曲外，大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另一支

是以聂耳、冼星海等人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

抗战时期，在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激发下，谱写了《向前进攻》等抗日歌曲，标志着创作作风的转变。建国后，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写过一些美术片的电影音乐。



徐采栋（1919—2016）

1919 年 3 月出生于江西省奉新县。1939 年至 1943 年在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学习，毕业后任甘肃玉门油矿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北京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6 年至 1949 年在法国格罗布电冶高等工业学院学习，后任法国巴黎大学高温研究部研究员，获工程博士学位。1949 年回国后任贵州大学工学院教授。1953 年至 1958 年先后任贵州省工业厅技术室副主任、主任，矿业处副处长，贵州省工业综合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1958 年至 1978 年任贵州工学院副院长兼冶金系主任，贵州省科协副主席。1978 年至 1993 年，先后任贵州省科学院副院长、院长，贵州省广播电视大学校长，贵州省副省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93 年后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名誉副主席，贵州大学校长。因病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8 岁。

徐采栋同志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徐采栋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冶金物理化学家、有色冶金专家。他长期从事有色冶金物理化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湿法冶金酸性浸出液除铁理论、有色金属硫化矿焙烧产物的稳定区间等问题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他在 50 年代主持高炉炼汞实验成功，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炼汞的产量和回收率。他主持的电解法制高锰酸钾的实验，在国内首次试制成功；主持的竖炉制钙镁磷肥实验成功，从 1958 年起各地陆续建厂生产。他在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金过程理论研究中，对于碳氮化钛形成及其对冶炼的影响方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独到见解，把我国化工冶金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他撰写的《炼汞学》《汞冶金的理论基础》《锌冶金物理化学》等多部专著和学术论文在我国冶金物理化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仍然是冶金企业和冶金专业学生的重要参考书。由于他在冶金物理化学领域的突出贡献，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78 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1979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徐采栋同志是九三学社的优秀领导人。他 1955 年加入九三学社，参与筹建九三学社贵阳分社，并担任副主委，从此与九三学社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他多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和贵州省委会领导职务，历任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会副主委，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他重视九三学社社会服务工作。1988 年，作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协调小组专家组组长，他深入贵州省毕节地区开展了长达 13 天的调研，提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和采纳。1991 年，他率领调研组，赴黔南、黔西南等 6 个地州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综合考察，提出了把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地区列入重点脱贫开发计划，并建立大西南连片贫困岩溶地区脱贫与生态建设试验示范区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最终列入国家“八五”计划。由于他在扶贫开发方面的突出贡献，被授予“星火特别荣誉奖”和“星火特殊荣誉奖”。他还推动九三学社与四川广元、山西临汾、内蒙古通辽等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九三学社科技服务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1997 年，他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院士委员会主任，带领九三学社的院士们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成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徐采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在担任贵州省副省长期间，先后分管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工作，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中共贵州省委的决策部署，为繁荣发展贵州教育科技文化事业、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心系教育，积极筹措落实资金，把全省中小学危房改建一新，为全省高校修建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三大件”，极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他还担任了贵州省科技扶贫服务团团长，组织 1 万名科技专家深入贫困地区，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担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多年，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不懈努力。

徐采栋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长期担任贵州省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团结带领科技人员潜心研究，攻坚克难，不断推动贵州省科研水平迈上新台阶。他在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任教多年，坚持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冶金领域的科研、教学骨干，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才。1997 年，他担任了由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而成的新贵州大学校长，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科学研究和科技产业开发，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推动教学改革，促进贵州大学办学规模显著扩大，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显著提高，成为贵州省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



谢家麟（1920—2016）

1920 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56 年加入九三学社。他 1943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51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途中受阻，被迫返回美国。1955 年，他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曾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八七工程”加速器总设计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总设计师和工程经理、粒子加速器学会理事长、高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 863 高技术主题专家组顾问。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谢家麟 1955 年初在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全新领域。他担任首席物理学家，优化加速器设计，带领解决速调管、加速管等关键技术问题，控制电子束流满足对肿瘤照射的需要，并把加速器的稳定度提高到医用的水平。同年 7 月谢家麟回国开展高能加速器研究，当时所需尖端器材受国际封锁，所需工艺远超当时国内的工业水平，他从研制基本关键部件做起，在没有人员派出、引进和采购国外器材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奋斗八年，建成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跨越式地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该加速器建成即投入国防急需，用加速器束流打靶产生的高强度脉冲辐射，模拟核爆来标定仪器，为“两弹”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该加速器的研制，发展了大功率速调管、加速管和微波管等一系列先进技术，推动了我国加速器事业的发展，奠定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人才和技术基础。

上世纪 80 年代，他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设计和建设，针对建造中国高能物理加速器的建议，反复权衡质子打静止靶和正负电子对撞两种装置的优缺点，最终确定 2.2 GeV 正负电子对撞机“一机两用”的方案，既为高能物理研究提供实验装置，也为同步辐射应用提供应用平台，同时填补两项国内空白。在方案设计过程中，他提出“六条”关键原则，成功指导了对撞机设计，他和工程指挥部带领工程团队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研制、精心调试数千台设备，组织攻关，指导完成速调管、加速管、能量倍增器、正电子源和高频腔等一系列加速器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性研制。

1988 年 10 月 16 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宣告建造成功。这是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也创造了国际加速器建设史上的奇迹，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成就时称“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建成和高效运行，使我国从此在 τ- 粲物理研究领域占据了国际领先地位。

谢家麟把握国际加速器发展动向，不断拓展新领域。1986 年他领衔向国家提出开展自由电子激光研究的 863 项目建议，基于国内的工业基础，于 1993 年领导建成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这是亚洲第一台产生激光并实现饱和振荡的装置，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及西欧之后实现红外自由电子激光饱和振荡的国家，奠定了我国自由电子激光发展的基础。这一重大突破受到国内外科技界的广泛重视，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科技新闻。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是集加速器、微波、磁学、激光、真空、控制等多种尖端技术的科学设施。在装置建设中，谢家

麟科学决策，选用经过考验的先进技术，制定热阴极微波电子枪注入器、波荡器和光学谐振腔等核心设备的技术方案，提出采用“前馈控制”，提高直线加速器的束流稳定性，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多项先进设备，突破性地解决了关键技术问题。

2000 年，谢家麟突破加速器设计原理，提出速调管同时作为微波源和电子源的紧凑型电子直线加速器的创新性构想，将电子直线加速器几十年沿用的三大系统精简为两个系统，简化了加速器结构，大大降低制造成本。经过四年努力，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紧凑型新型加速器样机，验证了设计理论的可行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

谢家麟是我国有重要影响的高能加速器发展战略专家。他十分重视和关注我国加速器发展战略，多次就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重要建议和指导意见，对促进我国加速器领域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发表数十篇科研论文并出版数部专著，其中《速调管群聚理论》已成为我国加速器方面的经典著作。他兼任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研究所的兼职教授、研究员，培养了一大批加速器技术专业人才。

谢家麟是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前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建造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带领团队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亚洲第一台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世界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和世界第一台紧凑型新型加速器样机。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物理学会胡刚复物理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十余项奖励。为纪念谢家麟在粒子加速器科学技术上的卓越贡献，国际天文联合会将一颗国际编号为 32928 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谢家麟星”；亚洲未来加速器委员会决定将其颁发的国际粒子加速终身成就奖命名为“谢家麟奖”；高能物理所把设立的一项青年创新基金命名为“谢家麟基金”。

谢家麟是一位有着 56 年社龄的资深社员。他牢记九三学社的宗旨和使命，继承和发扬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在九三学社组织内外发挥着一个标杆、一面旗帜的作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忠诚践行者。一次，中科院研究生院为加强素质教育，通过谢家麟所在九三学社支社邀请他与学生座谈，谢家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了一个关于“科学家与祖国”的报告，并热情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支社的同志都记得，在祝贺谢家麟 80 岁生日那次特别的支社大会上，先生语重心长地向年轻一代九三学社社员讲述的科学与人生的故事。社员如此杰出，学社必定优秀。在谢家麟的感召下，不少科技人员加入九三学社。科研工作中，他们以谢家麟为榜样，以对祖国的赤诚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为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为同能区性能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撞机，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贡献。



傅璇琮（1933—2016）

傅璇琮，1933 年生，浙江宁波人。历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195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助教。1958 年调至商务印书馆，度过了几个月的悠闲清静的“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学林漫录〉琐忆》）的读书生活。旋调中华书局任职，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曾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和编辑，担任《全宋诗》、《唐才子传校笺》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4 册，主编）获 1999 年国家图书奖，《唐才子传校笺》（4 册，主编）获全国第一届古籍整理优秀著作二等奖。主要著作有《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诗论学丛稿》、《唐人选唐诗新编》，合著有《河岳英灵集研究》等。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 15 时 05 分逝世，享年 83 岁。

消息与动态

“谢家麟星”命名仪式在京举行

1 月 4 日下午，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谢家麟等 5 位科学家小行星命名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颁发小行星命名证书、运行轨道图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出席仪式。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宣读小行星命名公报。命名仪式上，除谢家麟外，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和近年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郑哲敏、张存浩同时获得永久性小行星命名。截止目前，共有 12 颗以九三学社社员名字命名的永久性小行星在浩瀚星空中遨游。

我社 52 名社员喜获 2015 年度国家科技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 1 月 8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奖代表颁奖。我社 52 名社员主持或参与完成的 42 个项目获奖，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11 人，国家技术发明奖 4 人，国家科技进步奖 37 人。

其中，2 名社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们是：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主持研究，九三学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作为第 4 完成人参与研究的“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项目。2 名社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他们是：九三学社社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翟长海作为第2完成人，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胡进军作为第 9 完成人参与研究的“建筑结构基于性态的抗震设计理论、方法及应用”项目。此外，我社 9 名社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4 名社员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35 名社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5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共授予获奖项目 295 项，包括自然科学奖授奖项目 42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授奖项目 66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项目 187 项，我社社员获奖项目占总数的 14%。获奖社员中，70 后 15 人，接近总数的 1/3。最年轻的出生于 1982 年，最年长者出生于 1927 年。

茅以升诞辰 120 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行

1 月 9 日是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名誉主席，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诞辰 120 周年纪念日。当天，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茅以升与中国梦——纪念茅以升先生诞辰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主任王志珍，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出席座谈会。

韩启德回顾了茅以升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希望大家学习茅老与时俱进的爱国精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赤子报国的奉献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会上还举行了由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主编的《茅以升全集》新书发布仪式。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反映茅以升先生一生业绩的纪录片《天空那颗闪亮的星》。

王选纪念陈列室“创新历程厅”揭幕

1 月 20 日，在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著名科学家王选院士逝世 10 周年之际，位于北大方正大厦的王选纪念陈列室“创新历程厅”在京揭幕。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北京九三王选关怀基金理事长韩启德在仪式上强调，传承王选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王选院士夫人、北京九三王选关怀基金会副理事长陈堃銶出席仪式。

韩启德说，在王选老师逝世 10 周年之际举办王选纪念陈列室“创新历程厅”揭幕仪式，内心很不平静，相信王选老师如果在世，定会欣慰这 10 年来北大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王选为广大科研人员树立了榜样，他的精神和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大家。韩启德在深情回顾和王选共同工作时光以及结下的深厚情谊后指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

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王选老师身上的创新精神不仅是北大和方正的精神财富，更是所有科技界人士珍贵的精神源泉。我们要更加努力学习和传承王选精神，让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展现更大活力。

仪式上，韩启德、林建华、陈堃銶与方正集团董事长张兆东、北大计算机所教授肖建国和所长郭宗明共同为“创新历程厅”揭幕。韩启德、林建华分别为展厅题词。韩启德题写“永恒”两个大字，希望王选精神在人们心中永恒传承，林建华题写“王选先生永存”，寄托了对王选的缅怀之情。随后，韩启德、林建华等在陈堃銶陪同下参观展厅。

谢家麟同志逝世

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谢家麟，因病于2016年2月20日8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九三学社中央组织建设研究中心成立

3月2日上午，九三学社中央组织建设研究中心在京正式成立。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邵鸿说，九三学社中央组织建设研究中心是社中央组织建设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是我社在新形势、新任务的背景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问题、反映情况、推动工作，实实在在地为促进我社自身建设能力的不断提高发挥作用。

会上，邵鸿为研究中心主任戴晓雁、副主任周群英、研究员张和平、叶烈窑等20名同志颁发了聘书。

九三学社2名社员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2月29日，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暨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九三学社社员许丽萍、赵海伶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许丽萍是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连任上海市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在从事专业工作的32年中，她坚持科技创新，不断攻克技术难题，主持完成上海世博园区、上海虹桥交通枢纽、上海光源等重大工程300余项，编制技术规范20余部，她注重人才培养，倡导“领军人才引领、打造专家集群”理念，使许多中青年专家脱颖而出。作为人大代表，她勤于调研、敢于直言，提出许多关于城市安全与运行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荣获各类奖项30余项，其中，2008年荣获“上海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建设功臣”称号；2010年荣获“上海市十大建设质量精英”称号； 2012年荣获“上海市领军人才”称号；2014年荣获“中国勘察设计行业科技创新带头人”称号。

赵海伶是四川省青川县一位85后姑娘，经历过5•12汶川大地震。2009年，22岁的她从四川外语学院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生活，在家人和朋友的不解中，坚持选择回乡创业。她克服没有物流，没有住房等诸多困难，采用电子商务模式，在网上销售家乡土特产，一年销售额达上百万元。2010年，她成立海伶山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不但解决了自身就业问题，还带动一批大学生就业，帮助居住在深山的老百姓实现增收。她先后荣获5•12汶川大地震“新生榜样”、首届四川十大“溢彩女人”、2010年阿里巴巴“全球十佳网商”、首届“四川好人”十大年度人物等称号。

社北京市委举办“九三学社先贤”肖像画展

为纪念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成立暨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基层组织创建65周年，“九三学社先贤”肖像画展于2016年4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活动由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办，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承办。画展于2016年4月12日下午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马大龙，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副主委陆杰华，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秘书长刘永泰；北京大学副秘书长、党委统战部部长张晓黎，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张小萌，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刘忠范，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程和平。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主委郭召杰、夏壁灿，委员会成员和社员代表二十余人参加了开幕式。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大学委员会主委沈兴海主持开幕式。

在此展出的92位“九三先贤”中，既有参加“五四运动”的革命先驱，也有九三学社创始人和早期成员，更多的是为祖国各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们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毅然回国工作，或是开创学科领域的科技领军人。其中包括王淦昌、邓稼先、陈芳允、赵九章等“两弹一星”元勋，

王选、黄昆、师昌绪、谢家麟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众多在京院士。

徐采栋同志逝世

九三学社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贵州省原副省长，贵州大学原校长；我国著名冶金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采栋同志，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 2 时 22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8 岁。

王宇田同志逝世

全国政协第十一、十二届常委，九三学社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常委；海南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海南省委主委；主任医师，教授王宇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6 年 4 月 17 日 16 时 36 分在海口逝世，享年 60 岁。

九三学社 6 名社员和 2 名社员率领团队荣获 2016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

五一前夕，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苗文隆、李双斌、黄汉龙、李海全、霍仕平、常明昌等 6 名九三学社社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社员王贤理创办的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社员张福庆带领的技术创新团队——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据悉，今年共有 192 个先进集体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898 名先进个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896 个先进集体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纪念黄国璋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6 月 28 日，纪念黄国璋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在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举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邵鸿在讲话中从黄国璋的成长经历、治学为人、学术贡献、爱国民主等方面全面回顾了先生光辉不凡的一生。邵鸿指出，我们怀念黄国璋先生，要学习他胸怀祖国、奋发图强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注重实践、知行合一的科学理念；学习他无私奉献、薪火相传的宽广胸襟；学习他热爱真理、追求进步的民主精神。邵鸿强调，以黄国璋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时刻铭记黄国璋先生的崇高风范，传承黄先生“一片丹心照方隅，满腔心血付桃李”的人生境界，秉承爱国为民、求实奉献的人生信念，在民主与科学的道路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谱写出精彩纷呈的人生。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科学学院原院长杨胜天在发言中讲述了黄国璋先生两度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期间，用现代地理思想完善本科教学计划，系统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学术思想，积极推进地理教育从传统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的变革。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原副所长唐登银在发言中指出，黄国璋先生在艰苦条件下对中国地理研究所的筹建、运行和管理倾注了全部心血，先生及其领导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张远广曾经是黄国璋先生的学生、助教、秘书。他回忆并分享了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的 14 个春秋，归纳总结了黄国璋先生在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全国协作编写教材、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等 5 个方面所留下的宝贵财富。

刘荣汉是九三学社中央第五任秘书长，他说，黄国璋先生作为第一任秘书长是开创者，我是继承者。我们纪念他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整理过去的资料，将先生的感人事迹如实整理，传给后人。

湘潭东山学校校长王辉，黄国璋先生之子黄力民，学苑出版社社长孟白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周正朝，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九三学社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主委吴向东，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穆建民等先后发言，表达对黄国璋先生的怀念与崇敬之情。

黄国璋（1896 年 8 月 -1966 年 9 月）湖南省湘乡县（今湘乡市）人，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知名爱国民主人士、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座谈会由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郭悦主持。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办公室主任郑海博，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九三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副主委纪仲秋，九三学社湘潭市委原副主委张晋安，黄国璋先生亲属，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共 30 余人参加座谈会。



1994年9月，徐采栋副主席（右二）在山西临汾考察时，在郊区村办脱水蔬菜加工车间与工人一起劳动



1995年，徐采栋（中）考察宝钢集团



王世襄书法作品